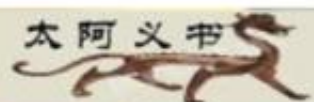


太阿义书



社会与思想丛书

开放 社会科学

&

华勒斯坦 等著

讀書中文網

www.rbook.net

墨香芬芳的故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华勒斯坦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108-00999-0

I. 开… II. 华… III. 社会科学-研究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4122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875
字 数	7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6.40 元

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成员
MEMBERS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委员会主席, 社会学, 美国。现任宾厄姆顿大学
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学教授。

儒玛 Calestous Juma

科学技术研究, 肯尼亚。现任非洲技术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凯勒 Evelyn Fox Keller

物理学, 美国。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与科学
哲学教授。

柯卡 Jürgen Kocka

历史学, 德国。现任柏林自由大学工业世界史教
授, 柏林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 波茨坦现代史研
究中心主任。

勒古尔 Dominique Lecourt

哲学,法国。现任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教授。

姆丁贝 Valentin Y. Mudimbe

拉丁系语言,扎伊尔。现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法语和意大利语凯南讲座教授,北美非洲哲学学会秘书长。

武者小路 Kinhide Mushakoji

政治学,日本。现任明治学院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

普里果金 Ilya Prigogine

化学,比利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现任国际物理和化学研究所所长,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普里果金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泰勒 Peter J. Taylor

地理学,英国。现任纽卡斯尔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

特鲁伊洛 Michel - Rolph Trouillot

人类学,海地。现任霍普金斯大学文化、权力和历史综合研究所所长,人类学教授。

前 言

古本根基金会(The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在八十年代后半期曾经主持过一个研究项目,以后成为“2000年的葡萄牙”(Portugal 2000)计划的富于成果的第一阶段。这个研究项目的重点在于探讨葡萄牙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些可能的发展轨道,并对这些发展轨道的框架以及所牵涉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思考。这些思考和研究成果已经作为“葡萄牙:下一个二十年”(Portugal - The Next Twenty Years)丛书的一种以葡萄牙文出版。

随着这一富于首创性的计划的开展,基金会还设法提供一定的资金来组织有关的学者对某些全球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社会的一个共同目标在于寻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探讨和解决其中所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对这一社会共同目标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在基金会的资助之列。有鉴于此,从不同学科

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的视角出发对社会科学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一番考察，
实在是恰当。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
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的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
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于具体背景中来加
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
话。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大学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
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
盘。

换句话说，如何打破现有的学科结构，这是否应该被
看成是社会科学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上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
境呢？

有鉴于此，古本根基金会采纳宾厄姆顿大学
(Binghamton University) 布罗代尔研究中心 (Fernand
Braudel Center) 主任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教授
的建议，组织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其中六位来自于社会
科学，两位来自于自然科学，两位来自于人文科学——共同
从事一项研究计划，其宗旨是要对社会科学的目前状况和
未来前景进行思考。

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创立
于 1993 年 6 月，由华勒斯坦教授担任主席，其组成方式反
映出欲取得如下报告中的分析结果而必需的深度和宽广的

视野。

《开放社会科学》内容严肃、丰富和富于挑战性,它忠实地反映出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创立后两年间的紧张而愉快的艰苦工作。委员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于1994年6月在里斯本基金会总部召开,第二次于1995年1月在巴黎的人文研究院召开,第三次于1995年4月在宾厄姆顿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召开。

《开放社会科学》一书所达到的学术水准,自然应归功于在委员会工作的各位才华杰出的学者。但是,倘若没有华勒斯坦的热忱、决断和以主席身份所做的领导工作,本书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此谨表谢意。

古本根基金会

目 录

前 言	古本根基金会	1
第一章 从十八世纪到 1945 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1
第二章 1945 年至今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		35
一、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		39
二、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		52
三、区分“两种文化”是否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		64
第三章 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		75
一、人与自然		84
二、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		87
三、普遍与特殊		92
四、客观性		96
第四章 结语 重建社会科学		101

第 一 章

从十八世纪到 1945 年 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立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 Preface to Charles Morazé, *Les bourgeois conquérant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7.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普通的宗教文献探讨这类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文献同样也探讨这类问题。除此而外,还有各种世代相沿的口传智慧,它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获得书面定型。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世界上的这一或那一地区的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知识被称为 *scientia*, 意为“知识”。当然,从语源学上讲,哲学的本义也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知”。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

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它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为皇家学会草拟了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①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C. P. 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亚历山大·柯伊雷(Alexandre Koyré)在梳理了自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空间概念的转变后指出:

新宇宙论所设定的无限宇宙在空间广延和时间绵延两方面都是无限的,其间永恒的物质依照永恒而必然的法则无止境、无目标地运动着。这个无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体论属性,不过也仅仅秉承了这样一些属性,其余的都被远遁的上帝随携而去了。^②

① 引自 Sir Henry Lyon, *The Royal Society, 1660 - 1940*,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41.

② Alexandre Koyré,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76.

自然,远遁的上帝的其他属性包括基督教世界所尊崇的种种道德价值,如爱、谦卑和仁慈。在此,柯伊雷对于取代它们的那些价值未置一言,但我们知道,远遁的上帝所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真空。如果说天空被推展到极限以外,人类的野心又何尝不是如此。进步成为一个操作性的语汇,它现在被赋予了一种新近获得的对于无限性的意识,并且随着物质成就的不断取得而大大强化了。

柯伊雷所说的“世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指宇宙。的确,可以认为,在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对于地球空间的感性认识正发生一个逆向的转折,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空间的有限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伴随着横越地球的探险航行,地球才逐渐地围绕着它的球形结构收拢。诚然,这个球体的圆周比哥伦布(Columbus)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它却是有限的。通过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并且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同一些探险航行还进一步开拓了商业通道,结果造成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将随之而不断地缩小。

然而,地球的这种有限性不是,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尽管无限进步的理想和景观要以时空的无限性作为支撑,但是,能否通过技术上的进展在人类事物中不断地臻于进步,那要取决于能否认识和探索世界,取决于是否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地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有限性怀有信心。的确,按照当时的一般假定,我们若欲取得进步,就必得彻底消除我们作为发现者所

受到的一切阻碍和限制,使自己能够自由地去揭示各种内在的秘密,发掘可触及的世界里的各种资源。迄至二十世纪,地球空间的有限性似乎主要地有助于推动西方人按照进步的要求去从事探险和开发活动,赋予他们的统治欲望以切实的可行性。在二十世纪,随着地球的空间距离缩小到一个似乎带有束缚性的水平上,地球空间的有限性甚至可以用来提供一个新的刺激,促使人们把探索的触角日益广远地向上向外伸张,从而更进一步地扩大统治的范围。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栖身之所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根据地,倒不如说像一座发射场,从这里,我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男人(以及少数几个女性)可以拔地而起,在太空中翱翔,确立自己对越来越广大的宇宙一体性的支配地位。

进步和发现或许是此处的关键词,不过,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词汇,我们还需要另外再加进几个词,如科学、统一性、单纯性、支配甚至“宇宙”。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并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者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视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

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词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①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

科学(science),亦即自然科学的性质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相形之下,与之对应的那种知识形式就不那么明确了,人们甚至在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它有时被称为文科(arts),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被称为文学或美文学(belles-lettre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有时甚至被简单地称为“文化”,而在德文中则被称为 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结成统一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

^① 这一点在英语和拉丁系语言中非常明确,但在德语中就不那么明确了。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一词仍然被当作一个表示系统知识的一般性术语来使用。英语中称为“humanities”(人文科学)的那一类学科在德语中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直译过来就是“关于精神或心灵问题的知识”。

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独占权),而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了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体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波斯人?”),对其形态各异的特色应当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自十六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

大学经历了一次复兴和改造。神学院变得无足轻重,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了,或者被哲学院里的一个小小的宗教学系所取代。医学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职能,继续成为一个特定专业的训练中心,而该专业现在已经完全被界定为一种应用型科学知识了。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法学院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

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

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自然科学早在大学复兴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某种自律的制度形态,它之所以行动得较早,是因为它允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支持。在十七、十八世纪,各种皇家学院应运而生,拿破仑还设立了一些高等院校,这反映出当权者愿意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家或许根本不需要大学就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

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对大学的复兴贡献至巨者并非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古典学者和民族文学学者,他们将大学当作一种手段,以争取国家对其学术工作的支持。他们把自然科学家也吸引到发展迅速的大学结构中去,并从自然科学家积极的一面获益甚多。不过,由此却产生出这样一个后果:从那时起,大学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正是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文化巨变迫使人们去澄清这场争论。政治和社会变

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并被赋予了一种合法性,光是提出一些有关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的假设性理论,已经很难满足这种要求。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无疑他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把社会变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时,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

另外一些人则更多地致力于为那些经历了社会解体或正面临类似威胁的国家重建社会一体性。他们将已有的民族历史叙述加以详尽的发挥,希望借此为新兴的或潜在的主权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过,这些历史叙述的主人公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民族”。历史被重新表述为 *geschichte*, 即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据认为,通过这种重新表述,历史就被赋予了一种完美的可信性。历史不再是为帝王作辩护的圣徒式传记,而是有关过去的真实故事,它解释现在,并为未来提供明智选择的基础。这种基于经验性档案研究的史学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结合在一起,反对“思辨”和“演绎”(据说只有纯粹的“哲学”才使用这类方法)。然而,正因为这种史学深切地关注民族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与任何其他的故事有着经验上的差异,因此它便对新兴“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所做的概括工作(即建立社会普遍法则的工作)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互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们按照一种逐次递降的决定论排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它作为一种非经验的活动依附于数学),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实践(包括文学、绘画和雕塑、音乐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时常接近于史学,如艺术史。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于文学艺术,事实上,它经常都是后者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于自然科学。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彼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

但是,上述种种均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科学已经战胜了(思辨)哲学,并在知识领域里逐渐地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奥古斯特·孔德(Augustus Comte)曾经宣布科学和哲学已经离异,尽管实际上这种分裂主要是对亚里士

多德式的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不是对哲学研究本身的拒斥。不过,提出的问题还是实在的:世界是否被决定论的法则所支配?(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还有地位和作用吗?这类思想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些假定的政治寓意。从政治上说,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人在竭力地捍卫特殊的、不受决定论制约的、想象性的事物,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这批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借维护现存制度和传统的名义抗拒以技术官僚体制为取向的变革,另一类则在努力地争取种种更为自发、更为激进的可能性,欲使人的作用能够介入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去。这场争论持续不断,但却难免有失平衡,它在知识领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科学(物理学)到处都受到顶礼膜拜,而在许多国家,哲学则被挤到大学系统中的一个越来越小的角落。对此,某些哲学家最终作出的反应就是重新界定他们的活动,以更好地适应科学风尚(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者的分析哲学便是如此)。

科学被宣布发现了客观实在,它所采用的方法能使我们走出心灵,而哲学家据说只会思想,并将他们的思想所得形诸笔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孔德和穆勒(J. S. Mill)致力于确立分析社会世界的种种规则时,他们都毫不含糊地坚持了对科学和哲学的这种认识。孔德恢复了“社会物理学”这一概念,借机阐明了他的政治关怀。他想把西方世界从“系统性败坏”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他认为,自从法国大

革命以来,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一直十分猖獗,由于这个缘故,“系统性败坏”业已“成为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照他看来,主张秩序的人坚持某些早已过时的教条(天主教的和封建的),而赞同变革的人则坚持某些源自新教的纯粹消极和毁灭性的理论。依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物理学将会导致秩序和进步的调和,因为它把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少数受过适当教育、有才智的精英”。这样,通过树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威,革命便会“终止”。新的社会物理学的技术统治基础和社会功能由此得以明确。

在这种新型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家将成为——用一个著名的套语来说——“研究普遍性的专家”。这意思是说,他们的任务是把天体力学(它在拉普拉斯(Laplace)对牛顿力学的发展中已经臻于完善)的逻辑应用于社会世界。实证科学代表着从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一切现实“解释”模式中的彻底解放。“因此,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中,若要使我们的各项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地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原因或最终结果。”^①

在英国,穆勒也与孔德持有相同的见解,他们两人有时还互相通信。穆勒不谈实证科学,而是大谈精确科学,但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天体力学的模式:“(涉及到人的科学)远不

^① Augustus Comte, *A Discourse on the Positive Spirit*, London: William Reeves, 1903, p. 21.

具备天文学领域中业已实现的精确性标准。不过,它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像现在的潮汐学或以前的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当初天文学计算也只不过是掌握了主要的现象,而对各种摄动现象则无能为力。”^①

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地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诚然,在1500至1850年期间,已经有一类文献涉及到许多今日归于社会科学名下的核心问题,如政治制度的运作、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关系准则以及有关欧洲以外的政治体制的描述。我们现在不仅能读到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Ricardo)、基佐(Guizot)、托克维尔(Tocqueville)、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等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的论著,而且还能读到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博丹(Jean Bodin)、配第(Sir William Petty)、格劳秀斯(Grotius)、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启蒙主义者的论著。我们甚至还能在这一时期发现有关社会犯罪的讨论,如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就写有这方面的书。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完全符合今日所理解的社会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学

^①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Vol. VIII of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Book VI, ch. iii., par. 2, p. 864.

者中间,还没有哪一个人自认为是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

在十九世纪,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与“思辨”相对而言)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一般性工作的一部分,其根本宗旨是要“认识”真理,而不是去创造它,直觉它。不过,这种知识活动的制度化进程并不那么简单,也绝非一帆风顺。首先,这种知识活动是应该成为一种单一的活动呢,抑或应该像后来那样划分成几个学科,对此人们在刚开始时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在刚开始时人们也不太清楚通往这种知识的最佳途径,不知道什么样的认识论是最富于成果或最具有正当性的。尤其不清楚的是,社会科学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成是“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如沃尔夫·莱彭尼斯(Wolf Lepenies)后来所表述的那样。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从来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去注意实际作出的种种决定,或者绝大多数人所抱持的流行观点。

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制度化进程发生于何处。在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我们至今仍在阅读的绝大多数十九世纪论著,也都是在这五个地区写就的。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然而,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围绕着少数几个名称已经有了广泛的趋同或共识,而其余的候选名称则或多或少被抛弃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名称主要有五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这份清单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东方学(在英语中称为 Orientalism),尽管其本身并未自觉地把自已看成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把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也包括进去,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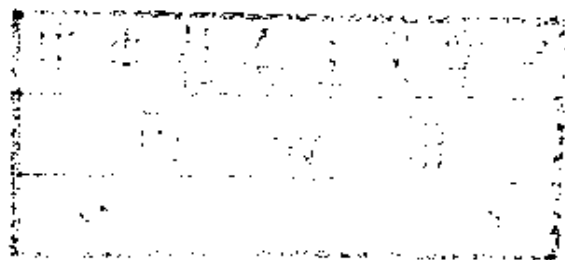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实际上是历史学。诚然,许多史学家都坚决反对给他们的学科贴上社会科学的标签,有的人甚至直到今日也依然如此。不过,我们仍将史学家与其他几门社会科学之间的争端看成是社会科学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容后再加阐明。史学当然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这个术语本身也很古老。对过去的叙述,尤其是对本民族过去的叙述,乃是知识领域里的一项人所熟知的活动,帝王传记式的历史一直都受到当权者的鼓励。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历史“学科”的显著特点是,它严格地强调应该去探明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即“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兰克 Ranke 的名言)。这种主张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那种讲述想象的或夸张的故事的做法,因为这些故事迎合读者的趣味,或服务于统治者和其他权势集团的当下目标。

我们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兰克的口号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出“科学”在同“哲学”的较量中所利用的各种主题——对客观、可知的现实世界的存在的强调，对经验证据的强调，以及对学者的中立立场的强调。而且，史学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不应该在先前的文字著述（图书馆，读书的地方）或他们自己的思想过程（书房，思考的地方）中寻找材料，而是应该在一个能够收集、存储、控制和支配外在的客观数据的地方（实验室/档案馆，从事研究的地方）寻找材料。

史学和科学在反对思辨哲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两者就都被纳入近代知识形态（与中世纪的知识形态相对）的范畴。另一方面，史学家之所以拒斥哲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哲学要求人们去探寻能够解释经验数据的一般构架；他们感到，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规律”的探索只会使人重新陷入谬误。于是，对史学家而言，其所秉持的拒斥哲学的立场就具有了双重意义，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们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著述既反映出科学在欧洲人思想中所占据的新的霸权地位，同时又强烈地预示和倡导一种注重个别性的反理论化姿态。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坚持认为他们应归属于文学院，而对正在缓慢流行的社会科学这个新范畴则持谨慎的态度，避免与之相认同。

诚然，十九世纪早期的史学家经常都把普遍历史的幻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史学家所秉持的反理论姿态，一旦同来自国家和有教养的公共舆论的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便推动他们主要地去写本民族的历史，而“民族”一词的



界定或多或少要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准,已经存在或正在确立的国家边疆目前所占据的空间范围也从时间上被回溯至过去。史学家强调,应基于对文化的深层情境知识而去利用各种档案文献,这样一来,在自家后院开展的史学研究仿佛就是最站得住脚的了。于是便产生出这样一个结果:尽管史学家们不愿再为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又不知不觉地在为“民族”进行辩护,而且经常是在为他们的新君王,即“人民”进行辩护。

无疑,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因为社会凝聚力能够由此而得到增强,不过在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是间接的。它不能帮助国家明智地决定现行政策,当然对理性改良主义所应采取的形态也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有见识的指导。在 1500 至 1800 年期间,不同的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已经习惯于请教专家(经常是公务员),在商业本位时期则尤其如此。这些专家所提供的知识可归在若干名目之下:如法理学(jurisprudence, 一个旧名词)和国际法(一个新名词),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新名词,它完全依其字面意义表示国家一级的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又是一个新名词,它原来指的是有关国家的定量数据),以及 Kameralwissenschaften(财政学)。大学的法学院已经开设了法理学课程, Kameralwissenschaften 也早已成为十八世纪德国大学的一个科目。然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出现一个叫做经济学(economics)的学科,它有时被放在法学院里,但经常都被放在哲学院(有时是以前的哲学院)里。由于十九世纪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之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

经济学的普遍化假设使经济学研究直接地面向现时,结果,经济史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常常只占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它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史学而不是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当然它部分地也独立于史学)。在十九世纪,人们还试图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不注重研究普遍规律,也不一味地强调个别性,而是去探寻制约着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在日耳曼地区,一个称为 Staatswissenschaften(国家学)的学科领域被建构起来,它的出现正是上述努力的一个主要成果。这个领域(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由经济史、法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几门学科混合而成,强调不同“国家”具有历史的特殊性,拒绝采用正逐渐通行于英法两国的学科区分标准。“国家学”这个名词本身即表明,它的倡导者们正试图占据政治经济学以前在英法两国曾经占据的思想空间,从而使国家学发挥与政治经济学相同的作用,即提供至少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用的知识。这个新创立的学科尤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得很兴旺。然而最终却由于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怯懦而败下阵来。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德国的社会

科学开始遵循英法两国所采用的学科范畴。国家学领域里的一些较年轻的领袖人物,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率先建立起德国社会学学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Staatswissenschaften 终于被 Sozialwissenschaften(社会科学)取而代之。

正当经济学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常规学科——它面向现时,侧重于研究普遍规律——时,一门全新的学科也正处于创建的过程中,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做社会学(sociology)。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positivist,这是孔德发明的又一个新名词)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然而实际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得到了制度化,并且经历了一次转变。迄今为止,这些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处理由于城市工人阶级人口的激增而引起的不满和骚乱。通过把他们的工作移进大学校园里,社会改革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们针对立法而进行的积极的、直接的游说活动。不过,社会学还是一直都保持着对普通人以及现代性(modernity)的后果的关注。或许是为了彻底割断社会学与社会改革组织之间的渊源关系,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也推到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得更晚一些,之所以如此,并

不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现代国家及其政治——不太适合于以探寻普遍规律为旨趣的分析,而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法学院拒绝放弃它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垄断权。法学院对这个学科的抵制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至少直到 1945 年以后发生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时为止,政治学家一直都十分注重研究政治哲学(有时也称为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容许政治学宣称对远溯至希腊人的那份思想遗产拥有继承权,因而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去研究那些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早已占据牢固地位的作家。

政治哲学不足以为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提供充分的辩护,它毕竟可以继续^①在哲学系里讲授,并且实际情况也确乎如此。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为了确保它的延续性,从长远来看,这就必然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对政治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在十九世纪(无疑直到 1945 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在这整个过程中,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作为它们共同发源地的那五个国家,不仅如此,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五个国家的大学完全忽略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其实它

们只不过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学科而已。

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还伴随着对这些民族的征服。按欧洲人的经验范畴来说,他们遇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有些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他们没有书写系统,他们似乎也没有共同的、覆盖广大地区的宗教系统,与欧洲人所拥有的技术相比,在军事实力上也较为薄弱。用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性术语开始被采用:在英语中它们通常被称为 tribes(部落),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则被称为 races(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它可以指按照肤色和其他生物学特征来划分的很大的人种群。为了避免造成混淆,这个词后来被弃置不用了)。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称为人类学(anthrothology)。正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大学校园以外的各种社会改革协会的活动,人类学在大学校园以外也主要是从探险者、旅行者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的;如同社会学一样,它随后也作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然而它又是一个与其他研究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完全隔绝的学科。

正如早期的史学家受到普遍历史的诱惑一样,某些早期的人类学家也迷恋于人类的普遍自然史。尽管如此,来自外部世界的社会压力还是迫使人类学家成为研究特定民族的人种学家,他们通常从生活于他们国家的内部或外部殖民地的民族中挑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几乎不可避免地

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采用一种围绕实地调查而建立起来的方法论(从而满足以科学精神从事经验研究的要求),并且还必须在某一特定的地区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观察(从而满足对所观察的文化具备深层知识的要求。这是一种为理解所需的知识,当然,由于科学家置身于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要获得这种知识是非常困难的)。

介入式的观察方法容易背离科学中立性的理想。除此而外,人类学家(如同传教士一样)经常都按捺不住地要替他或她所研究的民族充当调解人,在该民族与欧洲征服者之间往复周旋。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学家一般都是实施殖民政策的大国的公民,而他或她所研究的民族则是生活在殖民地的被征服者(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在东非和南非,法国人类学家在西非,美国人类学家在关岛或研究美洲印地安人的美国人类学家、意大利人类学家在利比亚)。凡此种种,也都不符合科学中立性的原则。把人类学家固定地安置在大学结构中,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举动,因为这样一来,人类学家便只能依照科学的规范前提继续从事人种学研究。

对这些文化“在未经接触以前”的原始状态的探寻进一步使人种学家产生出这样一个信念:他们在同——用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那句尖刻的话来说——“没有历史的民族”打交道。有鉴于此,人类学家原本可以改弦易辙,去接受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同的态度,即面向现时,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结构人类学在 1945 年以后所完成的正是这种转

向)。然而,在刚开始时,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却是去为他们所从事的差异性研究提供正当理由,捍卫“未能成为欧洲人”的道德合法性。因此,人类学家沿循与早期史学家相同的逻辑,坚决抵制建立普遍规律的要求;他们所推行的主要是一种注重个别性的认识论。

并不是所有的非欧洲民族都可以归入“部落”的范畴。很久以来,欧洲人便一直在同其他所谓的“高级文明”相接触,如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欧洲人之所以将这些地区视为“高级”文明,正因为它们确实有自己的文字,有地理上分布很广的宗教系统,并且(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庞大的官僚帝国这种政治组织形态。欧洲人对这些文明的研究始于中世纪的牧师和教士。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些“文明地区”在军事上仍然十分强大,足以抵抗欧洲人的征服行动,因而受到尊重,有时甚至受到钦佩,当然也难免引起人们的困惑。

然而,在十九世纪,由于欧洲在技术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文明地区相继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或至少是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其存在理由的。现在它成了一种更具世俗色彩的活动,并最终进入大学,在不断演进的学科结构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事实上,在东方研究被制度化以前,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也已经被制度化了,出现了一门在英语中称为 classics(古典学)的学科,专门研究欧洲自身的古代。古典学也是要研究一种不同于现代欧洲的文明形式,

不过人们并不把它与东方研究同等看待。相反,按照当时人们的看法,古典学展现了那些被确定为现代欧洲人祖先的民族的历史,完全不同于譬如说对古代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古代文明被解释为一个单一、连续的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它发展到顶点,便产生出了现代“西方”文明。它被看成是一部单篇英雄故事的一章:先是古代;随后是野蛮人的征服,通过教会确保了连续性;然后是文艺复兴,希腊—罗马的遗产被重新吸收进来;最后是现代世界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古代没有自身的历史,它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前奏而已。与此形成对比但却遵循相同的逻辑,其他的文明也没有自身的历史,而是由众多的史实所构成的故事,僵化,没有进步,最终未能步入现代社会。

古典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理论,尽管它明显地与对希腊、罗马的历史研究相重叠。古典学家试图创建一门独立于哲学(和神学)的学科,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各类文学(不光是哲学家所承认的那一类)、艺术(以及新近出现的附属学科考古学)和历史(它可以按照新史学的模式来进行研究,不过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其所占比重并不是太大)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古典学实际上接近于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以研究各主要西欧国家之民族文学为重点的学科。

古典学的美文学倾向,为正在进入大学课程表的形形色色的东方研究提供了一个背景色调。不过,东方学家在取得了这类前提之后,便开始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研究方

法。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像对待欧洲历史那样去重构一种历时的序列,因为按照假定,这种历史毫无进步可言。真正重要的是去理解和评价创造了这些文明(它们虽然被看成是“高级”文明,但在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停滞不动的)的那一套价值和实践。据认为,达到这种理解的最佳途径就是去细读能够体现它们智慧的各种文本,而这又需要语言学和语文学方面的技巧,类似于僧侣在研究基督教文献时所使用的这类传统技巧。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研究彻底地抵制了现代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免于科学精神的侵染。较之史学家,东方学家对社会科学更没有好感,认为它毫无价值。他们严格地避免与这个领域发生任何关系,更喜欢将他们的学科看成是“人文科学”(humanities)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还填补了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空白,因为在很长一个时期,东方学家实际上是大学里唯一研究过中国、印度或波斯的社会现实的学者。诚然,也有少数几个社会科学家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颇感兴趣(如韦伯、汤因比 Toynbee,以及在研究的系统性方面稍逊的马克思 K. Marx),但与东方学家不同的是,这些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之所以关注东方文明,并不是出于对这些文明本身价值的认识。恰恰相反,从思想上说,他们主要关心的一直是这样一个问题:最终迈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这其他一些文明?

在此,还有必要对三个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学科领域略加讨论,它们是地理学、心理学和法

学。地理学如同史学一样,也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在十九世纪晚期,它主要是在德国的大学里得到重建,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而刺激了它在其他地方的发展。尽管地理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问题,但它却反对任何替它归类的企图。地理学既想通过对所谓人文地理的关注(尽管它十分强调环境的影响,但它在某些方面所做的实际上是和人类学家相似的工作)填平它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又想通过对自然地理的关注填平它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不仅如此,地理学还试图依其研究对象而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学科,在 1945 年以前,它乃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唯一一门学科。这是它的优点,不过也可能是它的祸根。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对社会现实的研究日益地分化成一些独立的学科,出现了明确的劳动分工,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学便由于它那刻意消除学科界限、力求综合而漠视分析的强烈倾向而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也许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整个这段时间才得以继续存在,不过无论是就研究者的人数而言,还是就其学术声誉而言,它都无法与其他学科相比,经常只能充当史学的一个小小的附庸。结果,对空间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相对地被忽略了。对进步以及社会变革的各种组织策略的刻意强调,使社会存在的时间维度变得异常重要,而空间维度则被弃置一旁,任其含糊不明。如果认为过程是普遍的、命定的,那么从理论上说空间便是无关紧要的;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过程差不多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那么空间同样也只

能成为特殊性的一个要素(而且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要素)。按照前一种观点,空间只是为事件的开展或过程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场地,它本质上是惰性的,是一个摆在那儿的死东西。按照后一种观点,空间则成了一个影响事件的环境(在个别的历史中,在务实的国际关系中,在“毗邻效果”方面,甚至在马歇尔 Marshall 所说的凝聚过程和外部事物中)。不过,这些环境效应多半只能被看成是单纯的影响——若欲取得更好的经验成果,那就必须要考虑这类残余要素,可是它们对分析本身而言却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尽管未曾明言,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按照社会科学家的假定,人类生活必须要通过一组空间结构来加以组织,而这些空间结构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地图的主权领土。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这些政治疆界确定了其他关键的互动领域——如社会学家眼里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里的国民经济,政治学家眼里的国家,史学家眼里的民族——的空间参数。每一个人都假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空间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

心理学(psychology)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门学科也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它力图以一种新的科学形式来重建自身。然而,心理学研究并没有被归入社会领域,而主要地被归入医学领域。这意味着,心理学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与

自然科学关系的紧密程度。而且,实证主义者基于与孔德相同的前提(“眼睛不能看眼睛”),也把心理学推到这个方向。对许多人来说,只有建立在生理学乃至化学基础上的心理学才具有科学的正当性(scientifically legitimate)。因此,这些心理学家力图“超越”社会科学,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生物”科学。结果,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心理学都将其阵地从社会科学系转移到自然科学系。

当然,也有某些心理学理论侧重于分析社会中的个体。这些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家确实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继续留在社会科学阵营里。不过,大体而言,社会心理学并未成功地确立起一种充分的制度化自律性,它被心理学排挤到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正如经济史被经济学排挤到一个边缘的位置上一样。在很多情况下,它被吸纳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样才得以幸存下来。诚然,也有不少的心理理论表现出非实证主义倾向,如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文德尔布兰德 Windelbrand)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在所有这类心理学理论中,实力最强且影响最大的要数弗洛伊德(Freud)的理论。这一理论原本可以将自身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但却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未果。首先,它是从医学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其次,它在刚开始时名声不是太好,或多或少沦为了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活动,致使精神分析学家完全在大学系统之外创建这门学科的制度性再生产结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精神分析学继续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学派而存在,不过,这同时也意味

着,在大学里,弗洛伊德的概念主要不是在心理学系而是在其他的系里找到它们的位置。

法学研究是第三个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的领域。一方面,大学里已经有了一个法律系,它的课程表与它培养律师的首要职能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也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法学。它似乎过于规范化了,太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了。它的各种法则不是科学的法则,它的背景似乎也太个别化了。政治学彻底脱离了对这些法则及其历史的分析工作,以便去分析制约着政治行为的各种抽象规则,从中完全有可能恰当地引申出一些理性的法律系统。

社会科学的制度化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值得注意。这个过程发生时,恰值欧洲正在最后确立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地位。这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世界的这小小一隅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美洲、非洲和亚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大部分答案都是从主权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从比较“文明”(这一点已如前述)的角度给出的。事实上,不光是英国、法国或德国(不管它们各自的帝国大小如何),而是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整体显示出了优越的创造本领和军事实力。欧洲是怎样通过扩张进而主宰世界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恰好与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转折发生在同时。启蒙运动所推动的知识的俗世化进程得到了进化理论的确证,达尔文的理论超出了其生物学渊源,广为传播。尽管牛顿物理学作为一个范型仍然

主宰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但是达尔文的生物学还是通过进化这一似乎不可抗拒的纯理论概念,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所强调的一个核心观念便是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乃至曲解滥用,经常与在竞争中求成功的观念相混淆。只要对进化论加以不太严密的诠释,就能够为如下假定提供科学的正当性:不断的进步最终使现代西方社会取得了理所当然的优越性。阶段理论(stage theories,认定社会发展以工业文明达于极致)、辉格党人(Whig)对历史的论析、气候决定论(climatological determinism)以及斯宾塞(Spencer)的社会学都是这方面的,一些实例。不过,这些早期的比较文明研究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而是充分制度化的社会科学。由于这个缘故,它们便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因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合力摧毁了文明进步论赖以建立的某些自由乐观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 1850 至 1945 年期间,人们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了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实现这一步骤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

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

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从兰克、尼布尔(Niebuhr)和德罗伊森(Droysen)开始,史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与一类特殊材料,尤其是原始的档案资料及类似文献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强调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将过去的事实与当前的文化需要联系起来,以阐释学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构,坚持把现象乃至像整个文化或民族这类最复杂的现象作为个别物,作为历时的(diachronic)和共时的(synchronic)关联域的一些方面(或部分)来加以研究。

人类学家对世界其他民族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了重构。他们论证说,在西方人眼里显得怪异的各种习俗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起着保存和繁殖人口的作用。东方学家研究、解释和翻译了大量西方以外的“高级”文明地区的文献,“世界宗教”(它代表着与基督本位的观点的决裂)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概念,他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绝大多数以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首先都要强调它们与历史学之间的区分。既然如此,与历史学相比,它们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这类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要得出被假定制约着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第二,它们力

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它们强调有必要将人类现实分割成不同的部类,以便对其进行分析;第四,它们认为,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例如,可以从理论出发提出假设,然后再通过严格的、如有可能甚至是定量的程序来对其进行验证);第五,它们偏爱通过系统方法而获取的证据(如调查数据)以及受控的观察,而不太喜欢普通文献及其他残剩资料。

这样,社会科学便与注重研究个别事实的史学区别开来。之后,以探寻普遍法则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急于为他们各自的学科领域划定范围,并从根本上把这些领域彼此加以区分(不仅在研究主题方面,而且也在方法论方面)。经济学家坚持 *ceteris paribus*(其他条件均同)假设的有效性,以便去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仅仅关注政府的结构;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的新兴社会领域。

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大体上都非常成功。随着学科结构的建立,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生产结构,产生出了大量我们今天视为现代社会科学遗产的文献。截止到 1945 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党国家曾一度抵制(无疑经常是拒绝)这种学科分类。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意大利

的有关机构也完全采用了这套常规模式,苏联集团国家在五十年代后期也纷纷效尤。而且,到1945年,社会科学一方面与研究非人类系统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也与研究人类“文明”社会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产品的人文科学有了明确的区分。

社会科学的制度性结构第一次充分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明确的界定。然而,就在此时,社会科学家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结果,社会科学家的实践和思想立场与社会科学的形式组织之间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鸿沟。

第 二 章

1945 年至今 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

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

——米歇尔·福柯

*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p. 224.

1945 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影响了前一百年所形成的社会科学结构。首先是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以其无比强大的经济实力屹立于世界。在政治上，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是美苏之间的所谓冷战，二是非欧洲民族争取独立的历史伟业。第二个新动向是，在 1945 年后的二十五年间，生产力迅猛提高，人口急剧增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而拓宽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新动向是，无论是从数量来看，还是从覆盖的地区来看，大学系统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相应地，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也成倍增加。这三个新的社会现实中的每一个都给已经历史地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提出了问题。

美国以其强大的实力凌驾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这一现实状况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家对什么是最紧迫的问题，什么是处理它们的最恰当方法的界定。美国在战后十五至二十五年间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这意味着，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社会科学活动异乎寻常地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机构里，既然如此，社会科学家在确定问题的孰先孰后时难免就会受其影响。另一方面，非欧洲民族政治上的独立意味着，社会科学的许多假设将会遭到质疑，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那个已经结束或至少是行将结束的时代的政治偏见。

大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当的扩张具有一种非常

特殊的组织含义,它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学者们正在寻找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以显示他们的独创性或至少是对社会的有用性。在这方面,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化依据。经济的发展刺激了这一专业化进程,因为正是凭借它所提供的资源,这一进程才成为可能。

大学系统的扩张还有第二个组织含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各类机构规模上的急剧扩大,不独国家机器和经济企业为然,研究组织也概莫能外。主要受冷战的刺激,一些大国开始投资发展大科学(指需要大量投资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译者),这种投资也扩展到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然而与以往所能得到的任何资助相比,绝对数目却非常大。这种经济上的投入促使社会科学朝着更进一步、更充分的科学化方向发展。结果,出现了一些科学发展中心,它们一般都拥有集中的资讯和技术,其资金来源首先是美国及其他大国的政府,各种基金会(主要以美国为基地),其次是某些跨国公司。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社会科学的制度性结构有欠完备,美国的学者和机构都会直接地或间接地鼓励遵循既定的模式,并且特别强调社会科学内部那些更加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倾向。国家和私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大规模投资给予这些科学发展中心以毋庸置疑的优势,任何不那么严

格、不那么带有政策导向的研究规划都无法与之相抗衡。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它乃是各类技术成就的根基所在）在社会科学内部进一步取得了全球范围的合法性。不过，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已经告终，因此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而且也在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人们都开始听到一些新的声音。

我们将讨论发生在世界上的这些变化对下述三个前后相继的问题所产生的后果：（1）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2）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3）“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分是否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

一、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 区分是否有效？

在十九世纪后期，构成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有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

(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中的每一条在 1945 年以后都开始面临挑战。

或许, 1945 年以后的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便是出现了一个称为地区研究的领域, 它是一个新的制度性范畴, 用于把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在一起。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二战期间的美国, 在战后的十年里, 它在美国被广泛地实施, 随后又传布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地区研究的基本含义非常简单。所谓地区是指一个大的地理区域, 它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出现在这份清单上的是一些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地区: 苏联、中国(或东亚)、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东欧和中欧, 以及后来加上的西欧。在某些国家, 美国(或北美洲)也成了地区研究的对象。当然, 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精确地采用了这类地理范畴, 事实上, 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变化形式。

按照人们的设想, 地区研究既是一个学术领域, 同时又是一个教学领域, 它在一种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的“地区”(或该地区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于各门社会科学, 但有时也来自于人文科学, 偶尔甚至来自于某些自然科学学科——集合在一起。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多学科”领域, 从起源上说, 它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动机。美国因其在全球范围内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亟需了解不同地区的当

前形势,从而也就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地区在政治上正变得如此活跃。地区研究计划的宗旨就是要培养这种类型的专家。随后,首先在苏联和西欧国家,然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某些拉美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研究计划,并且其宗旨也是完全一样的。

地区研究将有关的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中,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学科联系,完全跨越了上述三种界限:历史学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面对着人类学家和东方学者;历史学家面对着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每一类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则面对着其他几类社会科学家。不仅如此,某些地理学家、艺术史家、研究民族文学的学者、流行病学学家甚至地质学家间或也加入到这个行列。这些学者共同制定课程表,在各自学生的博士培养委员会中担任委员,参加地区研究专家们的学术会议,阅读对方的论著,在新创办的地区研究的专业性跨学科杂志上发表论文。

姑且不谈这种学科间的相互促进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它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组织方面的后果无疑是巨大的。尽管地区研究是以多学科(这是一个在二战期间已经展开过讨论的概念)这一受限制的形态而呈现出来的,然而它的实践却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历史学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第一次(至少从研究者的人数来说)

开始了对非西方地区的研究。某些在过去仅仅研究西方世界的学科现在侵入到非西方世界,这样就颠覆了以往为诸如人种学(ethnography)和东方学之类的独立学科领域提供辩护的种种论据的逻辑。这似乎意味着,历史学和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及模型不仅适用于研究欧洲和北美洲,而且也适用于研究西方以外的地区。在二十年的时间内,人类学家放弃了人种学,不再以它来作为界定自己身份的活动,并开始为这个领域另外寻找根据。东方学家走得更远,他们索性连“东方学”这个名称也不要了,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将自己并入到历史系、哲学系、古典学系、宗教系以及各新建的以地区文化研究(不仅包括传统上归东方学家研究的文献,而且还包括现代文化成果)为宗旨的系里。

地区研究也影响了历史系和三个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的结构。到了六十年代,这几个系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教授开始致力于对西方以外的地区进行经验研究。就人数而言,历史学所占的比例最大,经济学最小,政治学和社会学则介于两者之间。这意味着,这些学科的内部讨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下述情况的影响:学者们所争论的问题、他们要求学生所修的课程、合法研究的主题,从地理覆盖面来说已经比以往扩大了许多。事实上,不光是研究主题,学者的来源也同样有了地理上的扩大。因此,可以说,在1945年以后的那段时间里,知识机构内部的社会局势经历了一番重要的演变。

对西方地区的研究与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之间的学术壁垒已经瓦解,这样便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并带有更深远的政治涵义的学术问题。这两个地区本质上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以往居于主导地位的假定是,这两个地区很不相同,因而需要有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来对它们进行研究。现在是否可以提出一个相反的假设: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根本不需要采取一种特殊的分析方法来研究非西方世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所争论的问题是,他们一直试图建立的普遍法则(规律)是否同样也适用于对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对于更加注重个别性的历史学家而言,这场讨论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非洲有历史吗?抑或只有那些“历史上闻名的民族”才有历史?

对这类诘难的学术应答,本质上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妥协性质,它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论点:从分析的层次上说,非西方地区与西方地区是相同的,但也不完全相同。这一论点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现代化理论。自然,它是建基于早先的社会科学文献中的诸多讨论和前提(不管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之上的,不过,有关现代化问题的文献却又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并且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变得非常重要。其核心论点是,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它们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处在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因此它们又不完全相同)。从国家政策来说,它被转换为对“发展”

的全球性关注,而所谓“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沿着普遍的现代化道路行进的历程。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对现代化/发展的关注倾向于将多门社会科学集结在一起,形成一些共同的研究规划,并对当局采取一种共同的姿态。国家对发展的政治承诺为将公共资金用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正当理由。

现代化/发展的特点是,通过把西方的历史发展解释为一种不断递增的、早熟的现代化成果,这一模式也能够适用于西方地区。由于这个缘故,以往面向现时、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便开始为使用非现代的材料寻找正当理由,尽管这类材料更不完备,而历史学家也开始思考:以探索普遍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各种普遍法则是否有助于阐明他们对过去的理解(甚或阐释性理解)。人们试图填平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史学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不过这一努力并非始自 1945 年,而是可以寻绎出一条更早的轨迹。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所谓“新史学”运动以及法国的一些运动(年鉴学派及其前驱)便明确地代表着这种努力。然而,只是到了 1945 年以后,这类工作才开始得到史学家的实质性支持。

的确,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寻求史学(的某些部分)和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的紧密合作甚至融合的努力,才开始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史学领域,那种认为该学科的常规形态已经无法充分满足现代需要的信念获得了一定的根据。史学家一直都比较擅长于研究过去的

政治，而不太擅长于研究过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事件，侧重于个体和机构的动机，而在分析处于历史长河（longue durée）中的那些不那么具有个性特征的过程和结构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结构和过程似乎完全被忽略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来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必须加大经济与社会史的比重，并赋予它一种独立的品格，使之成为理解一般历史的一把钥匙。

历史学科内部的各种变化借助于毗邻的社会科学而得到辩护。社会科学为过去的那些处于历史制度、事件和观念“下面”或“背后”的维向（如经济变迁、人口增长、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群体态度和行为、社会抗议，以及选举模式）提供了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研究工具：定量方法；诸如阶级、角色期待或地位差异之类的分析性概念；社会变迁模式。某些历史学家现在试图利用各种“集合数据”，如婚姻登记簿、选举结果以及税收单据。事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求助于社会科学。随着历史学（和人类学）更加开放地采纳定量研究方法，出现了一个循环增强的过程，金钱、学者人数和社会合法性得以相互支撑，强化了对社会科学概念之学术理据的自信。

寻求历史学科变化的努力有时还与从事社会和文化批判的愿望携手并肩。据认为，历史学家往往过分地强调共识以及各种制度的运作，而对冲突、剥夺、阶级不平等、种族关系和性别则重视不够。对公认范式的批判与对本专

业内外的既定权威的挑战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在德国，这种修正主义倾向进一步推动历史学家朝着社会科学的方向转移。采用分析性概念和理论方法这一举动本身便是对既定的“历史主义”范式（historicist paradigm，它强调阐释方法和语言必须尽可能地贴近原始素材）的一种反对姿态。某些社会科学传统似乎为发展一种“批判”史学或曰“批判的、历史的社会科学”提供了特殊的工具。然而，在另外一些国家，社会科学方法对激进的修正主义史学家的吸引力相对要小一点，例如美国的情况便是如此，在那里，人们不仅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不那么具有“历史主义色彩”的史学传统，而且还可以发现一种不那么具有批判性的社会科学传统。

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战后发展得很兴旺，部分原因在于，这几门学科都沐浴在自然科学的反射光芒之下。它们享有崇高的声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吸收它们的研究成果非常有趣的另一个原因。与此同时，某些社会科学家也开始进入以前保留给历史学家的领域。不过，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朝着史学领域的扩张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一方面，他们将相对比较特殊、狭隘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和程序，用于分析有关过去（有时甚至是来自于过去）的材料——例如对选举模式、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他们像处理经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变量或指标那样来处理这类材料，也就是说，将它们加以标准化（时间序列）、分离并相互关联起来。有

时这被称为“社会科学型史学”(social science history)。这些社会科学家扩大了自己的材料来源,但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或者应该以某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研究程序。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既不期待、也未曾发现多少有关过去的新东西。恰恰相反,有关过去的材料似乎证实了,或顶多是略微修改了作为他们基本兴趣所在的一般法则。有时,这类研究的成果对史学家来说变得极其重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过去。

然而,另有一些社会科学家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转向史学。这些社会科学家所感兴趣的是去描述和解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他们有时遵循韦伯的传统,有时遵循马克思的传统,有时则介于两者之间。由于他们的努力,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各种类型。这些社会科学家对其同行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他们已经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许多最好的早期传统失去了联系。他们所做的工作不太具有“科学主义”的性质,而更多地偏于“历史主义”的方向。他们严肃地对待各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将社会变迁放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核心位置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主旨并不是要检验、修正和制定普遍规律(如现代化的规律),而是要利用一般规则去解释各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现象,或从这些一般模式出发对它们加以说明。在六十年代,当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家转向社会批判时,他们也开始日益地表露出对非历

史主义的这种批判态度。他们对“主流”社会科学的批判包含着如下一个断言：这类学科偏爱共识的神话，忽略了社会变迁的核心地位；它们在将西方概念用于分析各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和文化时表现出了一种天真的、甚至是傲慢的自信。

就“社会科学型史学”而言，社会科学家是由于他们学科的自身逻辑和扩张性的动态机制而转向历史学的。他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填平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鸿沟，而是要扩大自己的数据库。“历史社会学家”则不一样，他们的工作牵扯到对流行方法论的批判。许多历史学家在提倡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一般法则时也抱有同样的动机，历史（或历史化）社会学家的著述与“结构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出现了某种趋同的态势。尽管两者在风格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在七十年代，这种趋同却开展得十分顺利，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对原始材料的确切把握、概括的水平、叙述性描写的程度、甚至脚注的方法。

历史学和其他几门社会科学有了更加紧密的合作，不过，这一举动仍属个别现象。而且，除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所展开的讨论之外，历史学与其他几门社会科学中的每一门也展开了一些独立的讨论：经济学（如“新经济史”）、政治学（如“新制度主义”）、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这种趋同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某一特定的社会科学传统的材料来源被

简单地扩大了,二是某些基本的方法论问题被重新提出来讨论。

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日益地相互重合,不过这种重合所引起的争论相对要少一些。社会学家成了开路先锋,他们早在五十年代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该学科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步其后尘,将他们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他们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使之囊括了一切具有政治寓意或政治意图的社会过程:如对压力集团、抗议运动和社区组织的研究。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然而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充分地关注经济过程。在战后的初期,凯恩斯(Keynes)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局面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后来,有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提出应当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如家庭或社会犯罪,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在战后的初期,所有这三门学科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

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数学模型。结果，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被削弱了。当社会批判开始引发这些学科的内部争论时，每一门学科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科学家在流行于本学科的实证主义学说中所发现的局限性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不过，在此同样没有必要夸大其辞。从组织方式上来说，三门学科仍然存有很大的差异，而且维护这种区分的也不乏其人。然而，在这些年里，就每一门学科的主流及批判性翻版而言，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学科在研究主题和方法论方面确实是在日益地趋于重合。

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门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新创一些带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如传播学（communications studies）、行政学（administrative sciences）和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

社会科学面临着各种问题，人们对学科的结构方式也从学术上提出了一些异议。很多人认为，对多学科越来越多的强调表现出社会科学对此所作出的灵活回应。他们感

到, 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与历史学的某些部分朝着更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的方向汇合, 一直都是一条创造性的途径, 它业已产生出了丰富的多学科成果, 因而值得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另外也有一些人对已经取得的成就不那么感到乐观。他们认为, “跨学科”这一退让形式不仅克服了现存学科之独特性的逐渐式微的逻辑, 而且也将这些学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重新确认了它们的合法性。他们敦促对各门学科进行更加激进的重建, 以摆脱他们所觉察到的思想混乱。

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 不管人们对此作怎样的评价, 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 1850 至 1945 年期间, 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 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 1945 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 新名称层出不穷, 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性基础: 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 新的学术团体, 新创办的期刊, 以及各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书目。

各门学科之间的区分是否具有有效性, 这个问题或许算得上是五六十年代批判性讨论的焦点。到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更明显, 战后出现的其他两个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起来。第一个问题是, 社会科学(事实上所有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Eurocentric), 因而社会科学遗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偏狭的? 第二个问题是, 给现代思想包上“两种文化”的外壳对其进行分类, 这种

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学术活动的有效方式？现在就让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

对于普遍性的宣称(如普遍的恰切性、普遍的适用性、普遍的有效性),不管怎样地受到限定,都是内在地蕴含于一切学术科目的合法化依据中的,这是学科的制度化要求的一部分。合法化依据可以从道德、实践、审美或政治的立场上提出,也可以在这几个方面的某种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然而,一切制度化知识都有这样一个预设前提:从当前的个案研究中引出的经验教训,对于下一个案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潜在个案的数目实际上是无穷的。无疑,任何这类主张都鲜能一劳永逸地令人信服。现代知识的三大门类(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有那些被认为处于每一门类内部的学科,都持续不断地在几条不同的战线(学术战线、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作战,以维护它们各自对于普遍性的宣称。原因在于,所有这类要求都自然而然地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只有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系统中,才有可能理解它们。而且,这些要求从来都必须通过各种历史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经久的制度和实践来加以推行。

任何一门学科（或较大的学科群）都必须以学术要求与社会实践的某种特殊的、不断变化的融合为基础。这些要求和实践相互支撑，然后又得到该学科或门类的制度化再生产的不断增强。变化所采取的最常见的形式便是适应，即持续、细致地对据认为是传承而来的普遍经验与传承的方式进行调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旦某一门学科得到了制度化，人们就很难不顾其普遍主义要求在当时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学术合理性而成功地对这些要求进行挑战。

无论人们怎样真诚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近年来，批评者们一直都在严厉地抨击社会科学在这一追求中的失败和欠缺。有些更为极端的批评者甚至提出，普遍性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不过，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仍然相信，普遍性是一个有价值的合理目标，尽管迄今为止社会科学一直都处于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偏狭状态中。有些人或许还会争辩说，那些以前被排除在社会科学领域之外的群体最近提出的种种批评，业已为实现真正的普遍主义创造了条件。

从许多方面来看，三门比较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所遇到的问题都最为严峻。这几门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模型，逐渐形成了三种事实证明不可能依其普遍主义形态而实现的期待：对于预见性的期待；对于控制的期待；以及对于可量化的准确性的期待（它是前两种期待的

前提)。在人文科学所开辟的领域里，辩论的问题有时被认为要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偏好，与此相反，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则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人们可以对社会成就进行测量，并且能够就测量的结果本身达成普遍的同意。

认为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能够产生出普遍的知识，这是一场打赌。现在回想起来，这场打赌实际上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与自然科学所界定的自然世界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研究对象包括了研究者本人，而且被研究的人还能够与研究者的展开各种各样的对话或辩论。在自然科学中，辩论的问题通常无须诉诸于研究对象的观点就能够加以解决。相反，社会科学家所研究的民族（或其后代），不管其观点是否为学者们所探求，都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讨论中来，而对研究者来说，他们的闯入经常都是不受欢迎的。这种闯入日益地表现为对普遍主义僭妄的挑战。持异见者——尤其是（但也不仅仅是）女权主义者（feminists）——对社会科学能否解释他们的真实状况提出质疑，他们仿佛在对研究者说：“你们的分析也许对你们自己的群体是恰当的，但却根本不切合我们的情况。”质言之，持异见者对普遍主义原则本身提出了质疑。他们宣称，社会科学认定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则实际上代表着人类中极少数人的观点。他们还争辩说，这极少数人的观点之所以逐渐地主宰了整个知识领域，只是因为这同一些人在大学以外的世界里也居于

统治地位。

各门社会科学自诩能够不偏不倚地解释人类世界,不过早在它们得到制度化以前,便有人在对这类优点提出疑义了,具体体现在从赫尔德、卢梭到马克思、韦伯等杰出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时至今日,这些学科更是备受抨击,被指斥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男权主义的(masculinist)、资产阶级的事业。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类抨击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重复了来自社会科学内部和外部的一些更早的批判,只不过这些批判基本上都被忽略了。

毫不奇怪,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当时的欧洲世界感到自己在文化上取得了凯旋式的胜利,从许多方面来看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欧洲都征服了世界。欧洲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在征服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将优越的技术归因于优越的科学和优越的世界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同样,将欧洲的成就看成是朝着普遍进步的冲刺,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在 1914 至 1945 年期间,西方世界经历了首次冲击,它所宣称的道德进步的真相仿佛被戳穿了。然而,到了 1945 年,西方世界又重新鼓起了勇气。只是当西方世界的政治统治在 1945 年以后受到严峻的挑战、东亚在七十年代成为一个新兴的、极其强大的经济活动中心时,对西方思想的文化普遍性的挑战才开始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进而言之,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那些感到自己在社会科学分析中被遗漏了的人们,而且也来自于社会科学内部。

西方世界的自我怀疑以前只存在于一小部分人中间,如今则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弥漫开来。

因此,正是在世界的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经过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在文化上的偏狭才变得突出起来。西方世界业已丧失了它在世界舞台上一度拥有的毋庸置疑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而文化偏狭的问题乃是这种状况在文明层面上的反映。不过,文明的问题并不采取直接冲突的形式,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非常暧昧的。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西方以外的学者,都并未形成对此问题采取统一立场(与其他群体的立场对立的更令人信服的立场)的群体。从组织形式上来看,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许多非西方学者都在西方的大学里受过训练,还有更多的人感到自己已经接受了西方学者的那一套认识论、方法论和推理方式。反过来说,有些西方学者(当然人数很少)对西方以外的社会科学家的当前思想也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受其影响颇深。

总的说来,在1945至1970年期间,在欧洲和北美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观念,在西方以外的地区同样也居于主导地位。的确,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在非西方世界有了相当大的扩展,而这种扩展经常都是在西方机构的赞助或帮助下实现的。这些西方机构大肆进行宣传,让人们把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各门学科当作具有普遍规范性的学科来加以接受。社会科学家也有自己的使命,在这一点上丝毫不亚于政治领袖或宗教领袖。他们力图使某

些实践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实现某些特定目标，如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在科学普遍性的旗帜下，他们试图对具有科学有效性的知识形式与超出可接受的范围之外的知识形式进行界定。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它们既能够主宰行动，又能够决定诸多假设性的普遍范式。于是，对这些观点的拒斥就被说成是一种针对“科学”的“冒险”行动，而且这似乎还意味着选择了一种不利于学术和精神安全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时期，西方的社会科学继续拥有强大的社会地位，它以社会科学典范的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而且，事实证明，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一使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看成是加入普遍的学术共同体的门径。

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对社会科学之偏狭性的挑战在刚开始时或许最主要地是针对着社会科学以普遍主义相标榜的那种姿态。批评者争辩说，社会科学事实上是偏狭的。这种批判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女权主义者对社会科学的男权主义取向提出挑战，不同的群体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挑战，后来，其他许多群体还对它们认为深植于社会科学诸多前提中的另外一些偏见提出质疑。就这些论点来看，尽管历史细节各异，但大方向往往是一致的。例如，批评者揭露偏见的真相，根据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和对象指出

偏见的后果。他们认为,从历史上看,为研究者队伍提供人员补充的社会基地是十分狭小的。此外,他们还对社会科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提出质疑。

在对这些批判进行分析时,应当注意把认识论挑战(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与政治挑战(political challenge)区别开来,尽管在学术争论双方的许多人看来,两者是互相联系的。政治上的挑战与大学结构内部的人员(学生、教授)补充方式有关(它同范围更广的政治领域里的类似挑战是一前一后的关系)。据认为,在社会科学中还存在一些“被遗忘了的”人群,如妇女、整个非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内部的各“少数”群体以及其他在历史上被置于边缘地位的人群。

赞成结束知识结构内部封闭的人员补充方式的论点之一是,这种人员补充方式会对有效知识的获得产生诸多潜在的不利影响。从最简单的层面上来看,据说在过去二百年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业已进行了一番自我研究,不管他们给自己下了什么样的定义;就连那些研究“他人”(others)的社会科学家也往往把他人视为自己的影像或反照。由此,什么样的解决办法能够获得赞同就不言自明了:一旦扩大了学术共同体人员来源的范围,那就完全有可能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我们只需将目前举行的各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题目或目前出版的各类学术著作的标题与五十年代进行一番匆匆的比较,就能够发现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社会科学家人数上的增加以及

在专业领域中谋求适当位置的需要所造成的一个自然结果，然而，为学者队伍建立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来源基地的压力，以及新研究领域合法性的增多，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明显原因。

然而，对社会科学之偏狭性的挑战要比研究者的社会来源问题更为重要。从社会科学家中间冒出了一些新的“声音”，其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超出了关于合法研究之主题或对象的问题，甚至超出了那种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评价的论点。这些新的声音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社会科学（当然还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推理中暗含着种种预设前提，其中有很多事实上都体现了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经验依据的先验偏见或推理方法，对这些先验要素应加以阐明和分析，并代之以更为确当的前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要求成了开放社会科学要求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借这类新理论的名义提出的新命题都是正确的或无可非议的。这里所表达的是如下一个观点：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检讨，以便揭露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定，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构成了今日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这些新的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借助于学识、分析和推理对我们关于差异性（种族、性别、性关系、阶级）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

非洲学者恩格尔贝特·姆文(Engelbert Mveng)在 1978

年曾写过一篇题为“从屈服到继承”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式的推理法或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以外,通往真理的道路还有许多条。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必须要实现非殖民化。”^①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要求,阐明理论前提的要求,实际上正是一种对非殖民化的要求,其宗旨是要改变造就了现存社会科学的特定制度化形态的各种权力关系。

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指明了传统社会的那些有别于现代社会的方面,然而,在此过程中,它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些社会内部秩序的复杂性。对于权力和身份之类的关键社会科学概念,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不同的观点。在许多非西方的话语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种种不同的概念和逻辑。有的认为权力是虚幻不实的,还有的认为合法性必须来自于实质内容而非形式程序。例如,大乘佛教将“虚妄”(maya)这一概念用于国家、权势阶层和统治氏族,目的是要证明盛行于一神教话语(monotheist discourses)的权力逻辑并非无所不在。道家提出合法的“道”的概念,认为合法性是与超越儒家的官僚合法性的混沌现实的一种存在性关联。至于身份的问题,大乘佛教相信身份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伴随着对其他共同体的接受。在加勒比海地

① Englbert Mveng, “De la soumission à la succession,” in *Civilisation noire et Eglise Catholique/Black Civilization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Colloque d'Abidjan Paris/Abidjan & Dakar: Présence Africaine/Les Nouvelles Editions Africaines, 1978, 1:141.

区（以及其他有非洲人聚居的美洲地区），语言、宗教和音乐形式与人种一种族范畴之间的界限一直都非常灵活，个人可以游刃有余地在这些界限之间来往穿梭。某些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谈到多重身份的过多出现时往往带有一种贬义，而当地居民则倾向于将这一点看成是优势而不是妨碍。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要证明这其他一些权力或身份观念有什么优点，而是要表明，各门社会科学有必要将这场辩论深入地推进到它们的分析概念的基础本身。如果社会科学是一种寻求普遍知识的活动，那么，“他者”在逻辑上便不可能存在，因为“他者”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主体。

总之，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不一定是对立的。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超越这一限制性框架呢？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存在着各种张力，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近二百年间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反复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场辩论的焦点所在。人们抨击普遍主义，认为它是一种乔装打扮的特殊主义，并因此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压迫性力量。毫无疑问，有些事情是具有普遍真理性的。问题在于，社会权力的操纵者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把当前的情势看成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职是之故，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关于真理的定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科学真理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因此，这里并不简单

地涉及到一个什么是普遍的、什么在演化发展的问题。处于演化发展中的事物能否与进步划等号,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真正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应该如何去描述社会科学家本人植根于其间的那个不平等的世界,真实地陈述它。普遍主义要求总是由特定的个人提出的,他们通常发现自己站在那些提出竞争性要求的人的对立面。由于在什么是普遍的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各种各样基于特殊立场的对立观点,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学者中立性的问题。自然科学早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测量者会对被测量者造成干扰。尽管这种情况在各门社会科学中或许表现得更明显一些,然而社会科学家却一直对此说法争论不休。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关于普遍主义的讨论将三个问题结合在一起:描述性陈述与分析性陈述之间的差异(两者可能同时为真);反映各种互相竞争的旨趣的陈述的有效性(所有这些陈述都可能同样地有效,也可能同样地偏私);作为学术交往基础的批判理性。我们很可能希望把那些隐藏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背后的范畴加以区分,也就是说,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有几个不同的层面,它们可以是对象,可以是目标,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元语言(meta-languages)。把各种元语言置于前台,使之接受批判理性的检查,这也许是我们能够把作为对象、目标和语言的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的唯一方法。

如果说普遍主义——所有的普遍主义——带有历史的偶然性的话,那么有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切合现时代的单一

的普遍主义呢？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一种类似于种族隔离的方式，还是应当采取一种社会整合的方式来解决偶然的普遍主义呢？是否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普遍主义，它能够超越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的那种拘泥于形式的普遍主义，并接受存在于普遍性内部的各种矛盾？我们能否促进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就如同在印度供奉众神的寺庙里一个单一的神拥有许许多多的化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们总是面临着双重的困境，因为各种流行的普遍主义究竟是怎么样的，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他们接受其智慧，那么他们会发现自己在理论前提上就已经遭到了排斥或贬低。但是，如果他们在是否遵从流行普遍主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那么他们又会发现自己在政治和学术两方面都无法在该系统内部发挥适当的作用，从而妨碍现状的改善。结果，在刚开始时，受排斥的人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在整合与分离之间来回摆动。当他们对此感到厌倦时，他们有时干脆彻底捣毁各种流行的普遍主义。社会科学目前正面临着类似的尝试，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开放各门社会科学，以便使它们能够对自身的偏狭性所遭到的合理反对作出适当的、充分的回应，从而证明其对普遍的恰切性、适用性或有效性的宣称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出发点乃基于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是话语共同体的必要目标。同时，我们也承认，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都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因为它提供

了转化的媒介,与此同时也为学术讨论设定了条件。这样一来,它便成了学术能量的源泉。我们还进一步承认,每一种普遍主义都触发了对自身的种种回应,而这些回应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一种或数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普遍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相信,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

三、区分“两种文化”是否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

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知识结构的内部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发展动向。它们源自大学里知识门类的两个相反的极端,但却都对“两种文化”这一区分的现实性和有效性提出了疑义。自然科学内部对牛顿物理学各项假定的酝酿已久的不满——这种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彭加勒(Poincare)那里——开始爆发出来:在各类学术著作中,在支持者的人数上,在公共视界范围内。当时,社会科学也正处在一种混乱状态中,其间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产生出一种分化的压力。毫无疑问,上述情况部分地也正是这同一种分化压力所造成的一個结果。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科学家在试图解决牵涉到日益复杂的现象的问题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而对于这样一些困难,旧的科学理论却越来越不能提供合理的解决办法。

从两个方面来看,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里的这些发展动向都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1945 年以后在各门社会科学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注重探寻普遍法则的认识论模型,恰恰是以把牛顿概念的智慧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为基础的,然而时至今日,在社会科学中运用这一模型的计划正遭到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其次,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于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后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arrow of time)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于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于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这不仅开始改变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内部斗争的权力平衡,而且有助于减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强硬区分。不过,尽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像过去那样把人类设想成机械的,恰恰相反,自然界必须被看成是积极的和富于创造性的。

笛卡儿式的经典科学观形容世界是一架自动机,它要受到决定论的制约,因而也就可以凭借因果律或“自然规律”来加以彻底描述。今天的许多自然科学家也许会争辩说,应当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世界。对世界进行描述。^①这是一个更缺乏稳定性的世界,一个比过去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世界,一个处于混沌状态(这些混沌状态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的世界,它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便是如何解释这种复杂性是怎样产生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不再相信,宏观世界原则上可以从一个更简单的微观世界中推导出来。许多人现在相信,各种复杂系统具有自我组织的特性,因此再也不能把自然界视为被动的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相信牛顿物理学是错误的,而是说牛顿物理学所描绘的那些稳定的、时间上可逆的系统仅仅代表着实在的一个特殊的、有限的部分。例如,它描绘了行星运动,但却没有描绘太阳系的发展。它描绘了那些处于或近于均衡状态的系统,但却没有描绘那些远离均衡状态的系统,而后者即使不比处于均衡状态的系统更加常见,至少也跟它们同样常见。一个远离均衡状态的系统具有种种时间上不可逆的条件,单单具备了对“规律”和初始条件的认识,不足以预测它的未来状态。恰恰相反,它表现出“时间之箭”的基本的建设性作用。在这一系统中,未来是不确定的,诸多条件也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所制定的规

① 参见 Ilya Prigogine, *Les lois du chaos*, Paris: Flammarion, 1994.

律仅仅罗列了各种可能性而非确实性。

这样一来,不可逆性便不再被看成是一种科学上的误解,一种由于科学知识的不充分性而产生的近似结果。相反,今天的自然科学家正致力于扩充动力学法则,以便把不可逆性和概率性也包括进来。根据现在人们的看法,只有这样,科学家才有可能理解那些从基本的描述层面上看推动着我们植根于其间的宇宙不停地运动的机制。由于这个缘故,自然科学希望把关于自然规律的观念与关于事件、新奇性和创造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它们能够互相兼容。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对各种物理现象来说,不稳定性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在生物学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有一些物种只是在最近才出现的,可是另有一些物种却已经存在了好几亿年的时间。同样,概率的存在和时间对称的打破也是进化的必要条件。

对复杂系统的分析对于社会科学分析来说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系统明显地也是由多种多样相互作用的单位所构成的,它们以层层套嵌的等级组织与结构的出现和演进以及时空中的复杂行为为特征。而且,除了带有固定的微观互动机制的非直线型动态系统所展现出的那种复杂性以外,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系统还包含着一些能够凭借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内在调适和学习的个别要素,这样便在传统物理系统的非直线型动态机制的复杂性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复杂性层面(这是一个与进

化论生物学和生态学共有的复杂性层面)。

用于分析复杂系统的各种方法业已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得到运用,例如,学者们在对随机出现的革新与长期的经济波动——它们似乎表现出受决定论法则支配的混沌状态的种种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便采用了这样一些方法。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类互相竞争的技术有可能被“锁住”,尽管本来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更好的技术可资利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技术所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后果正在日益地增多。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尤其是那些坚决反对在注重研究直线型均衡状态的科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探寻普遍规律为旨趣的分析方法的学者早就持有类似的观点。以非均衡结构的动力学为基础的科学分析强调多样化的未来、分叉和选择,强调对历史的依赖性,对某些人来说,还强调内在的、本质的不确定性。这种分析方法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些重要传统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通过“抬高人文的方面”结束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这对那种将知识分成三大领域的三分法提出了第二个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于那个被通称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领域。当然,文化是人类学家和人文学者早就在使用的一个术语,然而,在他们那里,这个术语通常并不带

有现在这种新的、强大的政治冲力。“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准学科领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它有自己的研究规划、学术期刊、学会和藏书。这一挑战似乎涉及三个主题,其中没有一个是新的。如果说有什么新颖之处的话,那也许在于它们彼此关联在一起了,共同显示出强大的力量。结果,这些观点在知识生产的制度化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科学(一种特定的科学)将哲学(一种特定的哲学)从知识合法性的赋予者的地位上赶走以来的二百年间,这种情况还是首次出现。

集结于文化研究的三个主题是:第一,性别研究以及各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对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系统的研究的极端重要性;第二,局部的、非常情境化的历史分析的重要性,许多人把这种分析与一种新的“解释学转向”(hermeneutic turn)联系在一起;参照其他价值对技术成就所涉及的各种价值的评估。尽管文化研究吸引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者,但它主要流行于如下三个群体中间: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人类学家,对其中的某些人来说,新的强调重点提供了一个能够取代人种学(或至少是能够与之相竞争)的新领域,事实上,人种学已经丧失了它在人类学这门学科中的统率地位;被卷入与现代社会中“被遗忘的”人(即由于性别、种族、阶级等原因而被忽略的人)相关的各种新兴准学科的学者,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能够帮助他们阐明差异性的理论框架(一个“后现代”

postmodern 框架)。

我们已经对旨在克服社会科学遗产之偏狭性的各种尝试进行了探讨。将这一点放在对两种文化之间区分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个框架内来加以考虑,又会给我们的讨论增加一些什么新东西呢?在构拟两种文化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经常都存在着一个未曾明言但却非常实在的假定:科学比哲学和文学艺术更合乎理性、“更硬”、更精确、更强有力、更严肃、更有效率,因而也更重要。这里的暗含前提是,不管怎么说,科学都更加先进、更具有欧洲性格、更富于阳刚之气。当性别研究和一切非欧洲中心主义研究的倡导者们在文化研究的重估框架内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要求时,他们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一些隐含的断言。

从根本上看,这同一个问题具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有时被构想成一个局部性与普遍性的问题,有时又被构想成一个中介与结构的问题。结构和普遍性被断定为非个人的,永恒的,或至少是持久的,无法通过人类努力来加以控制。不过,也并非人人都不能控制它们。结构似乎能够被有理性的科学专家所操纵,而普通人以及那些在结构中不那么强有力的群体对此则无能为力。有人提出,在分析社会现象时,结构乃是持续有效的。这一断言据说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社会动员以及不那么强有力的人改善社会状况的努力是不着边际的。普遍的东西被说成是遥远的,而“局部的”东西则被认为是直接的。在局部范围内,性别和人种/种族划分对分析的极端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越是接近于全球范围,据说就越不容易有效地组织起来,以便提出一些别的观点,捍卫一些别的利益,主张一些别的认识论。

对于文化研究的肯定,还涉及到第三方面的因素,那就是,学者们对技术进步的价值表示出了怀疑。怀疑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人对这种技术的产品持一种温和的怀疑态度,有的人则持一种全盘拒斥的极端态度。这种怀疑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生态环境受到广泛的关注,保护生态环境的运动此起彼伏;在学术上则表现为,各种价值重新回到了学术分析的中心舞台上(有的人可能把这一发展动向说成是哲学的回归)。技术据说是带有普遍性的,然而面对生态危机,这类宣称遭到了质疑。后现代怀疑主义正在逐渐地取代现代批评,几乎一切所谓的宏大理论都被归入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式之列而遭到抨击。文化主义的影响已经贯穿到所有的学科,各种解释学方法重新夺回了它们一度失去的阵地。在许多不同的学科里,语言成了讨论的焦点问题,它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学科的认识论自我反思的关键所在。

文化研究为某些现存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但与此同时又引发了一些别的问题。对中介和意义的强调有时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人类行为所受到的许多实实在在的结构性强制被忽略了,而这种忽略往往带有准唯意志论的色彩。强调局部空间的重要性,这容易让人忽视历史结构中的一些更带有普遍性的相互关系。除此而外,后现代怀疑主义有时还导

致了一种彻底的反理论姿态,它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其他一些对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同样持批判态度的观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仍旧相信,对统一性的探求乃是一门经过重建的历史型社会科学必须继续承担的义务。

尽管如此,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是像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某些新发展一样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正如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文化研究的鼓吹者所提出的种种论点也从根本上破除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这些文化主义方案对一切现存的理论范式提出了挑战,就连那些其本身也对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主流社会科学持批判态度的理论范式也无一幸免。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中,都有人支持这种观点,结果便导致了一些忽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传统分界的学术合作形式。

早在1945年以前,社会科学便因为游移于两种文化之间而处在一种内部分裂状态中。许多人呼吁取消各门社会科学,将它们按照个人的喜好要么并入自然科学,要么并入人文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现在是被要求去接受关于两种文化的概念这一深刻现实,并各按自身的条件加入到这一方或那一方。今天,一些共同的主题和方法是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被发现的。自然科学家所谈论的时间之箭其实是社会科学中偏于人文主义的一翼始终都很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与此同时,文学学者也在谈论“理

论”。不管这种理论如何地具有解释学的性格,也不管它宣称自己是如何地敌视宏伟叙事(master narratives),建构理论毕竟不是文学学者过去常做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也不是对社会科学中偏于科学主义的一翼的工作一直都关系重大的那种理论。不过,对于一个如此重视使用术语的群体来说,我们至少应当注意到,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们已经把“理论”转变成了关于他们自己的各种代码词的理论。

我们不能说两种(或三种)文化的诸多表现形式处于真正的和睦关系之中,但是,这些争论已经使人们对这类区分的明确性产生了怀疑。而且,我们似乎正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迈进,日益地把多个知识领域看成是互不矛盾的。说来也怪,所有学科的视点转移似乎都正在走向而不是远离社会科学的传统立场。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两种文化这个概念正处在被克服的过程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目前尚为时过早。有一点很清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那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

第 三 章

我们现在应该 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

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解决价值冲突的办法都只有寥寥几种。一种办法是通过地理上的隔绝。另外一种更主动的办法就是退出。弥合个别的或文化上的差异的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冲突原则上能够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征象，也就是说，能够成为增进交流和自我理解的手段。最后，价值冲突也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或暴力来加以解决。在我们今日生活于其间的全球化社会里，这四个选择有两个已经急剧地减少了。*

——安东尼·吉登斯

*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Polity, 1995, p. 19.

1945 年以来社会科学内部五花八门的争论,对我们今日应当建立的社会科学有什么意义呢?究竟又对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有意义呢?这些争论在学术上所蕴含的意义与我们所继承的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并不完全协调一致。因此,当我们着手解决各种学术争论时,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应当在组织上做些什么。也许以后的事实会证明,做前一项工作要比做后一项工作更加容易。

最直接的问题便是各门社会科学自身的组织结构问题。当然,它们一直都是一些学科。这意味着,它们的目标是训练未来的学者,而且它们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成功。然而,归根到底,学者的训练还不是最强有力的操纵机制。另外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那就是,学科控制了学者结束训练以后的职业样式。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无论是教学职位还是研究职位,一般都要求拥有博士学位(或具备同等学历),而且,大多数职位还要求在某一指定的学科取得博士学位。每个人在组织上都要归属于一个学科;在该学科的正规刊物或半正规刊物上发表论文,被看成是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不光在过去是如此,直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如此。研究生还被劝告(而且是很明智地劝告)要在公认的常规学科里拿学位。学者倾向于主要参加他们自己学科的全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各学科机构给它们的成员罩上一层保护网,唯恐越雷池一步。

另一方面,在 1945 年以后变得非常重要的某些学术领域里,诸多学科前提一直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最近

几十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对科学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往往依主题邀请与会者,多半并不考虑学科上的密切联系。今天,越来越多的主要科学评论杂志都有意识地忽略了学科界限。最近半个世纪出现的各种新的准学科和“研究规划”经常甚且通常都是由在多个学科里取得过学位的人组成的。

最重要的是,各门学科在资源分配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在最近几年里,这场争论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是,在经过了长时间持久的预算膨胀之后出现了一个预算收紧的局面。随着各新兴的准学科结构要求占有更多的大学资源并试图更加直接地控制未来的分配,它们便侵蚀了现存主要学科的权力。在这场争夺战中,一些目前占有资金较少的群体,竭力从学术上为它们所建议的资源分配的转移提供抽象的辩护理由。正是在这里,将会形成重建社会科学的主要的组织压力。问题是,按照新的学术范畴重新调整组织结构的压力是在一个一个的国家、一所一所的大学里被贯彻的。而且,这一倡议往往并不是来自于从事实际研究的学者,而是来自于行政官员,在他们那里,预算上的考虑有时压倒学术上的考虑。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组织分散的景象,五花八门的学科名称层出不穷,类似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也就是说,1850至1945年间建立学科的过程乃是一个不断减少社会科学能够划分成的门类数量的过程,最后只剩下我们今天所熟悉并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纳的少数几个门类。自那时以来,这一过程开始转到一个相反的方

向上去。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详述。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正在形成的格局的合理性(rationality)。

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几个超级领域三分鼎立的局面变得日益地模糊起来,这些组织问题更进一步加剧了。当然,事情也不仅仅如此;这里不光是涉及到社会科学学科内部组织边界的可能的重建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所谓的学院这类更大结构的可能的重建问题。这场围绕学科边界而展开的斗争一直都在无休止地进行着,但相对于小的重组而言,有时可能还需要来一番大的重组,在十九世纪初期便出现了我们一直在加以描述的这种大的重组模式。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二十一世纪初是否可能再度出现这样一个时刻?

可能的重建还牵涉到第三个层面,它不光是一个学院内部各系以及大学内部各学院的边界问题。十九世纪的重建工作部分地还使大学得到了复兴,也就是说,大学成了知识创造和知识再生产的中心场所。1945年以后,无论是从机构的数量来看,还是从教学人员和学生的人数来看,大学系统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其结果是,研究活动飞速地上升到教育系统的越来越“高”的层次上。1945年以前,有些研究者还在中学里教书,而到了1990年,这种情况再也见不到了,不唯如此,许多学者甚至还竭力避免在大学系统里从事初级或更低级别的教学工作。时至今日,有的人连博士生也不愿意教了。结果,各类“高级研究院”以及其他非教

学机构大量涌现。

同样,十九世纪学术交流的中心场所是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科学期刊。随着这些结构变得过分拥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各类学术报告会取而代之了;自1945年以来,这类学术报告会在全世界非常盛行。现在,就连这一舞台也变得过分拥挤了,于是便出现了一些由互不照面的学者们所组成的连续的小型结构。自然,这有赖于电子网络所促成的通讯条件的巨大改善。所有这些新发展至少都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未来的五十年里,大学本身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组织基地?抑或某些别的结构——独立的研究院、高级研究中心、网络、通过电子设备而实现的认识交流——将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取代大学的作用?这些发展动向或许代表着对由于大学结构的空前扩张而必然引起的各种问题的积极回应。然而,要让人们感到研究与教学和大学系统的任何有意义的分离是应该的甚至是必然的,那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便为这一新发展寻求公共的合法性,否则,维持学术研究的物质基础便无法存在。

当然,这些组织问题都仅仅限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内,然而,它们却构成了澄清各种思想问题的语境。为了在知识领域里取得富于成果的进展,有必要围绕一些最主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建立起新的、探索性的共识。这类问题可能有两个。第一个问题牵涉到研究者与研究活动之间的关系。在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曾经把近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概括地总结为“世界的脱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无疑,

这一说法仅仅描绘了一个历经数百年演化发展的过程。在《新同盟》(*La nouvelle alliance*)一书中,普里果金(Prigogine)和斯登杰斯(Stengers)则倡导“世界的复魅”(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世界的脱魅”这一概念代表着对不受启示性的和/或公认的智慧或意识形态限制的客观知识的探求。在社会科学中,它吁求我们不要假借现存权力结构的名义而去改写历史。这一要求是使思想活动从碍手碍脚的外在压力以及神话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基本步骤,至今依然有效。我们无意于将钟摆重新摆回去,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势必会再度陷入“世界的脱魅”力求将我们拯救出来的那个困境之中。

“世界的复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要求,它并不是在号召把世界重新神秘化。事实上,它要求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界限,使人们认识到,两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世界的复魅”意在更进一步地解放人的思想。问题是,在努力解放人的精神的过程中,中立科学家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韦伯提出的,而是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提出的),为把学术从专横的正统思想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这一值得嘉许的目标,提供了一条根本行不通的解决途径。从来就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从他或她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每一次测量活动在试图记录现实的同时都改变了现实,每一次概念化都要以某些哲学承诺为基础。对于虚假的中立性的普遍信念,迟早会构成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种种发现的真值的主要障碍。如果说这给自然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那么它便给社

会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要把“世界的复魅”转化为一种合理的研究实践殊非易事，然而，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当务之急。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而不仅仅是当作社会宇宙存乎其间的不变的物质现实，而重新安插进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看成是世界（和学者）藉以影响和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变量，我们就面临着发展一种方法论的必要性，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结构置于分析的前台，而与此同时又不把它们当作一些任意的现象来看待或利用。一旦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注重研究个别性的认识论与注重探寻普遍规律的认识论之间的陈旧区分便会失去它仍然具有的任何认知意义。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消除十九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或社会文化）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个方向事实上经常都被忽略了。然而，目前的研究实践并不符合各主要学科的正统观点。我们必须直接地面对并解决这些彼此分离的领域的存在问题，或更准确地说，我们必须充分地把这个问题重新开放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一旦新的构想有了牢固的根基，重建学科的思想基础也许就更加明确了。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小心。如果研究者不可能是“中立的”，如果时间和空间构成了分析的一些内部变量，那么重

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必须是通过来自于一切不同的地区、持有一切不同的观点(并且还要考虑到不同的性别、种族、阶级和语言文化)的学者的互动而提出的;而且,这种世界范围的互动还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动,而不只是在彬彬有礼地走过场,暗中鼓励世界一部分地区的科学家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另一部分地区的科学家。要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组织这种世界范围的互动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构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又一个障碍。不过,克服这个障碍也许是克服其他一切障碍的关键所在。

既然如此,我们对于“开放社会科学”的种种可能的步骤又能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并不存在什么我们能够据以对知识结构的重组进行裁定的现成蓝图。相反,我们想做的事情是鼓励集体讨论,对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道路提出一些建议。但是,在考虑重建计划之前,我们认为还有如下几个主要的方面值得更充分地进行讨论和分析。它们是:一、拒斥人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区分(这是一个至少从笛卡儿以来一直植根于西方思想的区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二、倘若拒绝承认国家提供了社会行动发生于其间且必须在其间加以分析的唯一可能的和/或主要的边界,这又有什么潜在的意义呢?三、一旦接受了一与多、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无穷无尽的张力,并且认为这种张力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特征,而不是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四、从科学的不断演化的前提来看,什么样的客观性是合乎情理的呢?

一、人与自然

自然科学一直都在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转变,它日益地将宇宙看成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于是,宇宙便被设想成是一种能动的实在,而不是一架受处于自然之外的人操纵的自动机器。与此同时,社会科学也在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转变,日益地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趋同比以往更加明显,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两者都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系统,而在这些系统中,未来的发展将成为时间上不可逆的过程的结果。

某些社会科学家已经对行为遗传学近期的种种发现作出了回应,他们极力地想让社会科学表现出一种更接近于生物学的取向,有人甚至还试图根据从基因工程得出的推论重新恢复遗传决定论的某些观念。在我们看来,选择这条道路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倒退。我们感到,自然科学的晚近发现给我们的真正启示在于,我们必须比以前更严肃地对待复杂的社会动态。

乌托邦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而自然科学对此则没有太多的兴趣。当然,乌托邦必须立足于现有的各种趋向。尽管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确实的未来,然而未来的意象却会影响到人类

目前的行动方式。由于排除了确实性,知识分子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而中立科学家的概念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此点已如上述。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大学不可能继续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乌托邦的概念与可能进步的概念密切相联,然而它们究竟能否实现,这并不像许多人以前认为的那样,仅仅取决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而是取决于人类创造性的增加,取决于自我在这个复杂世界中的表现。

我们从过去那个充满各种相互冲突的确实性——不管它们是与科学、与伦理学还是与社会系统相联系——的社会走来,现在正步入一个令人满腹狐疑——其中也包括对各种确实性的内在可能性的怀疑——的社会。或许,我们正亲眼目睹一种不再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类型的结束。我们呼吁把强调的重心放在各种复杂的、短暂的和不稳定的事物之上,因为在今日,这是与声势浩大的跨学科运动步调一致的。我们绝不是在呼吁放弃实质理性的概念。怀特海(Whitehead)说得好,无论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学者,还是自然科学家都面临着一项对双方来说都极其重要的共同事业,那就是世界是可理解的;他们必须“建构一个融贯的、逻辑的和必然的一般观念系统,以使我们经验中的每一个要素都能够据此得到解释……”。^①

^①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correcte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8, p. 3.

在选择各种可能的未来时,资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扩大决策参与范围的要求也是一种全球性的要求。我们希望社会科学向这些问题开放,然而,与十九世纪不同,这绝不是呼吁建立一门社会物理学,而是在强调对如下事实的承认:尽管我们对自然宇宙和人类经验的历史建构过程作出了一些互不相同的解释,然而它们彼此之间并不矛盾,都是与进化联系在一起。在过去二百年间,现实世界把各种当前的政治问题强加给学术活动,迫使学者们把某些特殊的现象界定为普遍共相,因为这些现象在当下的政治情境中蕴含着种种潜在的意义。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挣脱现时代的各种转瞬即逝的强制,从而对社会现实达成一些更长远的、持久的和有用的诠释。在社会科学必然经历的分化和专业化过程中,我们对下面这个从知识的创造中引发出来的一般性社会问题注意得太少了:如何才能避免在有知者与无知者之间制造一个鸿沟?

超越这些直接、当下的压力,这不光是从事实际研究的学者的责任,而且也是学术官僚机构——大学的行政官员、学会、基金会、主管教育和研究的政府机关——的责任。它要求我们认识到,在着手解决一个复杂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时,我们绝不能够把这些问题分解成一些便于分析性处理的小的部分,因为那样做是无济于事的。相反,我们必须认清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认清人与自然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二、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

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家构成了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的种种过程便发生于其间。几门(至少直到 1945 年)主要侧重于研究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历史学以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然就更不例外了。诚然,人类学和东方学并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然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些学者所研究的地区并没有被看成是现代社会结构之所在。现代社会结构不言而喻地处于现代国家之内。1945 年以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促使历史学以及三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将自身的经验领域扩张到非西方世界,这样一来,这些非西方地区也开始被纳入到以国家为轴心的分析模式中去。“发展”是 1945 年以后的一个关键概念,它首先便是指每一个被当作个别实体来看待的国家的发展。

毫无疑问,总有一些社会科学家持相反的意见,他们并不认为国家是如此自然的一个单位,以至于它在分析上的优先性只须假定而无待证明。然而,在 1850 至 1950 年期间,这些持异议的社会科学家人数并不太多,他们的声音也不都是那么地惹人注意。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们对那种认

为国家不言而喻地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自然边界的观点提出了更严肃的质疑。这种局面的出现,乃是由于两个变化的并非偶然的结合所致。第一个变化发生于现实世界,国家似乎已经丧失了成为现代化和经济福祉的中介的希望,因此不再受到大众和学者的尊重。其次,知识领域里所发生的某些变化(我们一直都在描述这些变化),也促使学者重新审视以前不容置疑的种种预设前提。

社会科学家许诺给我们的具有确实性的知识,乃是他们所秉持的进步信念的一个明显结果。它在这样一个信念中得到了表达:通过“专家们”的具体操作,社会将不断地取得进步,而在此过程中,“颁授权力的”国家在改造社会的努力中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科学被期待着去促动这个理性的、渐次的进步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边界被看成是构成了追求这种进步的自然骨架。当然,在知识领域里,也包括在社会科学内部(例如在十九世纪),一直都有人在不断地对那种过于简单化的进步观念提出挑战。不过,面对持续的技术成就,以前的每一次挑战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而且,民主化的根本冲力也导致了对国家的不断增多的要求,人们急迫地吁请国家利用其财政和预算权力来改善生活条件,重新分配财富。于是,国家作为进步的实际操办者的地位从理论上说似乎已经固若金汤了。

不过,在最近几十年里,重新分配的速度有所减慢,滞后于对重新分配的飞速增长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所提供的满足也开始被认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从六十年代

开始,人们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灭感。自那时以来,世界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慢慢地孳生出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人们不禁要问,社会科学家所许诺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尤其重要的是,国家的改革事实上能否带来真正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自然性便被严重地削弱了根基。“思想要立足于全球(总体),行动要立足于本地(局部)”,是一条故意略去国家的口号,它代表着对作为改革机制的国家的信心的逐渐丧失。这在五十年代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学者都从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站在国家的立场上采取行动。

由于行动从国家的层次上转移到了全球和地方的层次上(两种行动的区别在于,前者被认为能够保证一个确定的未来,而后者看上去则更不确定,也更难以操纵),因此,在许多看来,自然科学家和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们所采取的新的分析方法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模式。两种分析模式都把不确定性(和局部性)当成是极其重要的分析变量,认为它们不应当被淹没在决定论的普遍主义之中。这样一来,国家作为概念容器的自明性——这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既来自于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历史学又来自于更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性派生物——便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成为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

当然,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并没有排除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或按通常的说法(尽管是错误的),国际关系的

研究,每一门社会科学内部都有一些专门研究所谓的国际舞台的分支领域。跨国现象业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这给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也许期待着这些分支领域里的研究者率先对此作出回应。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部分一样,向来都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框架之内展开的。这种研究主要采取比较研究的形式,将不同的国家作为比较的单位;或者采取“对外政策”研究的形式,其目的是要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去研究跨国结构的种种新出现的特征。很久以来,在各门制度化的社会科学中,对全球层次上的复杂结构的研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就如同对地方层次上的复杂结构的研究被忽略了一样。

自六十年代末以来,人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每一门学科内部,在跨学科之间),试图削弱以国家为中心的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努力都是与历史化的倾向,尤其是将更长的时段用于经验分析的倾向携手并肩的。这种分析单位的变换被贴上了许多不同的标签,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史、世界体系分析和文明研究。与此同时,对“地区”的关注也再度兴起,这里的“地区”既包括大的、跨国的地区(如最近兴起的对东亚作为整个世界的—个地区的关注),也包括—国内部某—小的地区(如经济史的原发工业化 proto-industrialization 概念)。在此没有必要从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对其中的每一项研究进行检查,需要注意的是,每一项研究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

按传统模式而制度化的社会科学的那些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发起了挑战。这些研究的自身逻辑究竟将其倡导者们推至多远的地方,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有的人赞成与传统学科彻底决裂,而不赞成继续处在这些学科的边缘,他们希望与一种基于全球性的空间关系项的新的异端相汇合。

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乃是一种理论简化,它假定存在着一些同质的、等值的空间,而每一空间都构成了一个主要通过诸多平行过程而运行的自律系统。这种简化的局限性在对复杂的历史社会系统的研究中,比在对原子式和分子式现象的研究中应当更明显一些,因为在后一类研究中,这种方法已经被看成是明日黄花了。

当然,拒绝承认国家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地理容器,这绝不意味着国家不再被看成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关键性的建制,一项对经济、文化和社会过程有着深刻影响的建制。很明显,要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研究,都必须首先对国家的种种机制有所了解。真正不需要的倒是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国家构成了社会行动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边界。那种依照国家边界所定义的单位来组织社会知识的方法是否真有效率,现在已经遭到了怀疑。在这种挑战中,社会科学的近期发展蕴含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一些重要转变。一旦我们放弃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假定(这一假定在过去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对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都具有根本的意义),一旦我们承认这一视点经常都可能构成认识世界的障碍,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围绕着这一假定发展起来的、

并且确实是以这一假定为基础的学科划分的结构本身提出疑问。

三、普遍与特殊

在社会科学中，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张力向来都是一个争论得十分激烈的问题，因为它一直都被视为具有直接的政治涵义，这样便妨碍了心平气和的讨论。浪漫主义对启蒙概念的反拨和重新表述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这场争论与拿破仑时期的政治论战——这些论战乃是由法国大革命推动起来的某些进程发展到极致而产生的结果——不无关联。在当代社会科学讨论中，这个问题又重新凸现出来，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西方世界重新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加之西方世界内部那些自认为受到文化压迫的群体也纷纷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我们已经追溯了这场争论在社会科学内部的种种表现形式。这场重新兴起的争论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后果，那就是，人们要求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多文化的”或文化间的特征。

把各种新的前提——它们回应了建立一门更具有多文化特征的社会科学的要求——插进社会科学理论框架的努力，遇上了形形色色乔装打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兴。社会达尔文主义乃是必然进步论的一个特殊变种，而且是

一个影响颇大的变种。它的最主要的论点是，进步是社会斗争的结果，而社会斗争要遵循优胜劣败的规律；因此，干扰社会斗争便是在干扰社会进步。这些论点有时还得到了前面所说的遗传决定论的进一步强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将任何与“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中的败者相关联的概念归入非理性和/或不现实之列。这种直截了当的谴责，经常把矛头对准那些不具备强有力的社会身份的群体所持有的一切价值观，以及其他一些对下述信念持批判态度的研究方案：即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和西化必定是相互联系的。

技术统治理性(technocratic rationality)将自身呈现为近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级的形态，然而事实上，它在许多方面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任何不适于手段一目的的合理性模式的概念，以及任何不具备直接功利性的制度的合法性。那种把个体主要安置在国家的界域之内的概念框架倾向于将不适合于这一框架的行动者当作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来对待，认为他们终将随着进步的不断推展而被彻底根除。不计其数的概念、价值、信念、规范和制度被归入这一不受欢迎的范畴之内，倘若有人严肃地看待它们，那将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可供选择的 worldview 及其倡导者都遭到了遗忘和压抑，被从现代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了。

今天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大批的学者，都坚决拒绝这种排斥其他可供选择的价值的做法。由

于发现(或重新发现)了植根于近代理性思想中的种种主要的实质非理性要素,这一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究竟应当如何严肃地看待世界观的多元性,与此同时又不丧失这样一种意识:即我们完全有可能认识和了解一组一组事实上对全体人类来说是共同的或能够成为共同的价值。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突破那种用于描述被当作“他者”的个人和群体的封闭语言。在社会科学分析中,这些个人和群体仅仅扮演了客体的角色,与之相对的是一些作为主体的个人和群体,他(它)们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合法性,分析者们一般都把自己归到这个行列中去。在这里,意识形态要素和认识论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混淆或重合。对西方以外的众多社会科学家来说,政治要素、宗教要素与科学要素之间的区分似乎并不完全合理有效。

迄今为止,许多对社会科学的偏狭性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往往都在强调一项消极的议事日程,那就是否定一切虚假的普遍主义。他们对各种自称的普遍主义原则能否适用于众多的特殊个案,以及(或者)普遍主义是否可能、是否值得向往提出了质疑,并且给出了一系列根据不同的社会构成成份来界定的准学科范畴,用以取代普遍主义。到目前为止,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主要后果便是特殊主义在数量上的增多。除了那种认为被统治的(因而迄今为止基本上被忽略了)群体的声音应当得到承认的明确论点之外,还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我们必须证明,吸纳这些群体的经验何以对

取得有关社会过程的客观知识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普遍主义从来都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因此,我们并不想再一次指出社会科学在排除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时所失去的东西,而是应当进一步表明:一旦我们将越来越多的世界历史经验纳入到社会科学中去,我们又能够对社会过程增加一些什么新的认识呢?但是,不管以往的各种普遍主义形态是如何地偏狭,如果仅仅把传统学科的地盘简单地让给坚持这种偏狭立场的学者,那将是非常不明智的。若想恢复平衡,就必须在现存的学科中据理力争,与此同时再开辟出一些超越现存学科(而不仅仅是处于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渠道。

我们还进一步敦促学者们更充分地意识到学术研究的多语性。选择一种语言经常都预先决定了研究的结果。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bourgeoisie* 和 *Bürgertum* 这两个中产阶级的概念实际上界定了两种极其不同的范畴,因而也暗含着两种迥然有别的经验测量方法。我们期待着社会科学家至少能够意识到概念意义的范围。一旦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有效地掌握了几门主要的学术语言,社会科学研究就能够开展得更好。语言知识能够帮助学者们开阔思路,接受其他的组织知识的方法。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这两种相反形态之间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张力,要达成对这些张力的有效的、富于成果的理解,也许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程。然而,只有当多语性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组织上得到合法化时,它才能够真正地繁荣起来。因此,在教学中、在

学术会议上实际地运用多种语言，乃是十分必要的。

同行之间必须要有一种相互尊重的气氛，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对话和交流。目前闯入这些讨论中的激烈的情绪化修辞，实际上反映出了某些深层的社会冲突，因此，光是口头呼吁并不足以推动学者们展开文明礼貌的辩论。我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要求：一方面是普遍的恰切性（适用性、有效性），另一方面是多种文化的持续的现实性。能否同时对两者作出回应，那要取决于能否首先从组织的层面上作出富于想象力的回应，能否对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学术实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社会科学在探索一种经过更新和扩展的有意义的多元普遍主义的过程中，应当保持开阔的视野，广泛接纳针对一切文化（社会、民族）而展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四、客观性

从一开始，客观性的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讨论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本报告的开头曾经讲过，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它旨在“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客观性”一语被用来表示为达成这个目标而作出的适当努力。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这样一层意义：知

识不是先验的；通过研究，我们能够学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能够突破原有的期待，体会到种种意想不到的惊奇。

一般认为，“客观的”的反面是“主观的”，后者通常是指研究者在收集和解释数据时搀进了自己的先入之见。这被看成是在扭曲数据，从而也就降低了数据的有效性。既然如此，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呢？事实上，不同的社会科学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几门侧重于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强调应该尽量张大数据的“硬性”方面，使之具备最大限度的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从而消除主观性的危险。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它们便着力地去收集有关现时的材料，因为在这里，研究者最有可能对数据的性质加以控制。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历史学家则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他们主张采用未经中间人（以前的学者们）沾染（扭曲）过的原始材料，采用与研究者个人无涉的材料。这就促使他们去收集产生于过去、因而也就是有关于过去的定性材料。在这里，情境的丰富性能够帮助研究者充分地理解相关的动机，而在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境中，研究者则只能将他自己的模式（这种模式被看成是他自己的偏见）套到他所处理的材料上去。

这两种方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取得客观数据，对此人们一直都表示怀疑。在最近几十年里，由于社会科学的形势发生了如上所述的种种变化，这种怀疑被表达

得异常强烈。人们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谁的客观性?”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对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性的怀疑甚至是全盘怀疑。有人还暗示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的人的知识。

我们同意,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植根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各种前提和偏见,而这些前提和偏见会干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中立的”学者。我们也同意,对社会现实进行照相式的再现是不可能的。一切数据都是从现实中挑选出来的,这种选择要以某一时代的世界观或理论模式为基础,要受到特定群体所持立场的过滤。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的基础乃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因而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我们所说的客观性是指绝对中立的学者再现了一个外在于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

客观性还有另外一层涵义。客观性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学习的结果,它代表着学术研究的意图,并且证明了学术研究的可能性。学者们彼此之间竭力地想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发现和解释是有效的。他们仰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能够为其他人所重复使用,他们将这些方法的细节和盘托出,供其他人鉴察。他们还希望自己的解释能够适用于最大多数的现成数据,能够比别的解释适用于更多的数据,并且在此过程中证明这种解释是一贯的、实用的。总

而言之,他们将自己的解释交付给所有对特定主题进行研究或系统思考的人,供其在一种主体间的脉络中作出判断。

我们承认,迄今为止,这一目标并没有充分地甚且是经常地实现。我们也承认,社会科学家以前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着诸多的系统性错误,许多人打着客观性的幌子推行自己的主观观点。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尽力地勾勒出这一连续的扭曲过程的本质。我们甚至还承认,要纠正这样一些错误,不能仅仅诉诸于主体间性的理想(an ideal of intersubjectivity),而是必须为集体努力提供更坚实的组织基础。我们所不接受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科学必须因此而被归结为一些杂七杂八的私人观点,其中的每一个观点都同等有效。

我们感到,推动社会科学去反对知识的零碎化,这能够使社会科学达到一种有意义的客观性程度。我们感到,坚持让社会科学朝着兼收并蓄的方向发展(从学者的来源、对多种文化经验的开放性、合法研究主题的范围等方面来说),这能够增进获取更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性。我们感到,强调一切社会现象的历史性,这能够减少从现实中得出某些不成熟的、基本上是天真的抽象概念的倾向。我们还感到,留心一下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那三个问题(更好地评价人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区分的有效性,对社会行动发生于其间的界域给予更宽泛的定义,使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得到恰当的平衡),这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去发展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更有效的知识。

总而言之，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意味着更有效的知识也将通过社会而成为可能。对知识的社会基础的承认与客观性的概念一点也不矛盾。相反，我们认为，通过重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社会科学，这种可能性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条件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评，并建立起更加实在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

第 四 章

结 语

重建社会科学

我们在本报告中试图阐明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从十九世纪后期到 1945 年期间,它又为什么被持续不断地分成一组特定的常规学科?第二个问题是,1945 年以来世界上的一系列新发展是如何使这种学术上的劳动分工受到质疑的?因而又是如何将前一时期已经进入讨论日程的组织结构的问题重新开放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阐明近来争论不休的一系列基本的学术问题,并提出一种我们认为若想继续前进就必须采取的最佳立场?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以及近期的争论来看,社会

识的水平已经下降了。

社会科学的分类乃是围绕着两个矛盾而建立起来的。这两个矛盾一度曾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第一个矛盾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第二个矛盾则存在于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学科与注重探寻普遍规律的学科之间。除此而外,还有第三个矛盾,那就是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的矛盾。今天几乎不再有什么人公开地为这种对立进行辩护了,然而实际上,它仍然盘踞在许多学者的意识深处。

除了针对目前的学科划分而展开的争论以外,还有一个资源的问题。现有的学科门类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抗议,应付这一局面的最主要的行政手段就是大量增加跨学科的训练和研究规划。由于新的要求还在不断地被提出,因而这一过程也在继续向前推进,毫无衰颓的迹象。训练和研究规划的增加需要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可是在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知识界的现状是(尤其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相比),席卷几乎每一个国家的财政危机使人力物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学术困境产生出了一种内在的压力,促使他们极力地扩大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和种类。相反,行政管理人员却一心一意地在想办法节省开支,出于这个目的而将现有的机构加以合并。我们并不是在暗示多学科的东西太多了,绝对不是的。相反,我们是想指出,从组织的层面上看,这不是在朝着统一的学术活动的方向发展,而不过是徒然增加了大学名称和研究规划的数量而已。

两种压力发生冲撞（而且是严重的冲撞），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希望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对现有的各种机构进行一番严格的审视，并且努力地使他们对一种有效的劳动分工的经过修正的学术感知与他们必然要建立的组织框架相一致。如果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自己不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毫无疑问，知识机构里的行政管理人员就会替他们做。任何人都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对大规模的重组进行判决的资格，即使有人具备这种资格，也未必是一件好事。然而，即使我们放弃大规模的、急遽的、戏剧性的重组方案，而采取一种别的策略，那也不能糊里糊涂地蒙混过去，指望情况会自然地好转，问题会自然地得到解决。这是因为，混乱、重合和资源匮乏在同时加剧，它们合在一起，无疑会对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很大的障碍。

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现实情况也应当记住。尽管我们一直在描述社会科学的一般格局，然而详细的分类则要依国家的不同而不同，甚至经常要依机构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在今天，无论是就不同的学科来看，还是就同一学科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表现形态来看，学科的内在凝聚力和灵活性都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变革的压力并不是相同的。除此而外，变革压力的大小还要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科学家所采取的不同的理论视角，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科学家群体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地卷入到公务活动和事务性工作中去。最后，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共同体还处于不同的政治情境（国

家的政治情境、大学的政治情境)中,这种差异影响了它们的兴趣方向,从而也就决定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赞成或强烈反对行政性重组。

无疑,我们只能要求更多的灵活性,这是一条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了三四十年的道路。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过,问题的缓和总是赶不上问题的加剧。道理很简单,大学里的每一个系都自成一个小组,在那里,学科的安全感经常都会占上风,因为很大一部分实实在在的决策权都操纵在系里。基金会可以向一些富于想象力的学者群体提供资金,然而职务晋升和课程设置则要由系里来决定。个人所宣布的良好动机并不总能有效地遏制住各种组织压力。

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分析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

的确,目前正出现一些特定的社会科学家(事实上还有非社会科学家)群集,有的围绕着特定的兴趣和主题——人口、卫生、语言等等——而组成,有的则围绕着分析的层次(专注于个别的社会行动,或专注于大规模的、长期的社会过程)而组成。不管主题的区分或“微观/宏观”的区分是不是今日社会科学知识领域里组织劳动分工的理想方式,它们至少与譬如说政治和经济的区分一样合理。

创造性实验的机遇在哪里呢?读者定能发现很多这样的机遇。在此,我们可以指出在学术光谱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点上所发现的一些机遇。一端是美国,那里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大学机构,还有来自于内部的强大政治压力,要求或反对重建社会科学;另一端是非洲,那里的大学相对说来出现得较晚,传统学科也未达到很牢固的制度化水平。在非洲,由于公共资源的极度贫乏,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势:社会科学共同体被迫不断地创新。无疑,世界其他地区也各有其特殊性,因此也可以进行同样有趣的实验。这种实验的一个场所也许就是某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当然,随着西欧建立其自身的共同体结构,在大学系统里也为创造性实验开辟了实实在在的空间。

在美国,大学结构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多元文化主义得到提倡,由此引出的种种问题,以及科学研究工作本身,业已成为公共政治讨论的一个主题。受其影响,科学领域里的某些新发展所引发的的问题也可能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去。这就为从事实际研究的社

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动机，促使他们去处理这些问题，从而阻止各种临时性的（激昂的）政治考虑过深地侵入到一个如此重要以至于无法按选举动机来决定的过程中去。美国有在大学系统里进行结构实验的悠久历史——它在十九世纪晚期通过对德国研究班制度的改进创立了研究生院；同样也在十九世纪晚期，创立了选修课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基础课”提出了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创了地区研究；在七十年代开创了妇女研究，制定了“种族”研究规划。我们并不是在对这类创新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想借此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大学系统一直都为实验留有空间。也许美国的社会科学共同体还能够再度为我们一直在描述的那些非常实际的组织问题提供富于想象力的解决办法。

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则面对着这样一个现状：许多从前的机构被解散了，某些大学科目也被取消了。迫于巨大的经济压力，许多学者只好离开大学，在大学机构外面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因此，在这里也有很广阔的实验空间。当然也存在着一个危险：他们有可能彻底照搬西方大学的现存结构，因为这些结构代表着一个与他们的直接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们也许根本认识不到西方大学系统自身所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不过，目前已经出现了某些实验的迹象。例如，在前东德柏林的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历史系新设了一个欧洲民族学的

分系,欲使所谓的历史人类学能够在史学内部占据一席之地。这在德国,或许在整个欧洲都是一个创举。历史人类学也成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正式科目,不过在那里,它没有被放在史学的内部,而是与史学和社会人类学并列在一起,处于同等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里,体质人类学也渐渐地被合并到人文生物学中去。

欧洲共同体十分强调通过交流计划、通过鼓励新的泛欧洲研究加强其内部各大学的联系,它试图创造性地面对学术语言多样化这一问题。我们或许期待着它所找到的解决办法能够恢复社会科学活动的语言丰富性,能够为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关系出发而提出的问题之一提供某些答案。一些赋有特殊的欧洲使命的新型大学很可能被建立起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维德里那欧罗巴大学 Europa-Universität 便是一个实例),因而也存在着无须改变现存组织结构而重建社会科学的机遇。

在非洲,实验的进程也已经开始。目前非洲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比较黯淡,但它却为其他形式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类学术研究并不一定反映世界其他地区所采纳的学科方法。大量有关社会—经济演化进程的研究都要求研究方法不能固定,而是必须保持开放,以便接纳新的知识;它们鼓励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除非洲以外,其他的非欧洲地区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这些地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即资源有限,各门社会科学缺乏

深厚的制度化根基。由于这个缘故,整个拉美在过去三十年间创立了十分成功的 FLACSO 研究和训练机构。这些机构起着类似于大学机构的作用,但却不依赖于传统的知识范畴。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独立研究机构尽管数量还十分有限,但却为研究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舞台。这类机构中的一些表现出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它们力图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门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于学科界限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它们已经成了政府官员的政策思想的主要来源。同样的情况目前也发生在某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当然也发生在某些西方国家。苏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科学政策研究小组制定了一个课程表,其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各占一半。

目前正在兴起的可归入这些新框架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会导致一些可供选择的、统一的知识群,现在还很难说;不过,可以断定的是,许多旧的范式,以及为捍卫、培育和保护它们而建立的各种机构从未发挥真正的作用,或者已经崩溃了。这些地区并未彻底陷入过去那种学术上的死胡同,因而也就为学术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比较开阔的空间。这种自我组织的倾向是从相对比较混乱的情境中产生出来的,它也许能够鼓舞我们去支持处于世界大学体系的常规道路以外的其他这类自我组织的倾向。

我们正处在现存学科结构分崩离析的时刻,我们正处在现存学科结构遭到质疑、各种竞争性的学科结构亟待建

立的时刻。我们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对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鼓励这种讨论,并且阐明已经出现的种种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篇报告的一个首要宗旨。此外,我们还认为,至少有四类结构性发展是社会科学知识机构里的行政管理者(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管教育和/或研究的政府部门、教育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组织等等)所能够且应当加以鼓励的。事实上,这些发展开辟了一些有效的途径,使我们能够从学术上澄清社会科学的作用,最终实现对社会科学的更充分的重建。

一、扩展大学内部或与大学联合的各类机构,集合各方面的学者围绕某些紧要主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共同研究。当然,这种机构已经出现了,只不过数量还十分有限。一种可能的模型便是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该中心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其近期的年度课题包括身心问题、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变化模型、乌托邦问题。关键在于,这种工作时间为一年的研究小组应当细致地做好先期准备,广泛地招聘人员(从学科、地区覆盖面、文化/语言区域和性别这几个方面来看),与此同时还应充分地强调以前观点的一贯性,以使交流活动能够富于成果地进行。

二、在大学结构内部制定跨越传统界限、具有特定的学术目标并且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比如说五年)得到资金保障的整合的研究规划。这不同于传统的研究中心,后者必

须自筹经费,其寿命是无限期的。这类研究规划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它们为期只有五年。因此,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经常性实验的机制,使得参与者一旦获得了最初的经费,就不再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研究者只是针对新的研究计划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而不是要立即着手实施新的教学计划,因而在此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或许是,应当允许某一研究计划的倡导者通过这种计划证明他们的方法是实用的、有效的。

三、采取强制性联合聘用教授的办法。按照目前的惯例,教授仅仅隶属于某一个系,而且该系的专业一般都与他们所拥有的高级学位相关。偶尔,某些教授也在外系“兼职”,不过这或多或少只能算是一种经过特许的例外情况,经常只是为了照顾情面而已;教授本人并不被鼓励过分积极地参加“第二个”(或“次要的”)系的活动。我们希望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在我们所设想的那种大学结构里,每个人都同时受聘于两个系,其中一个系的专业与他或她所拥有的学位相关,另一个系的专业则与他的个人兴趣相关,或与他所做的有关研究工作相关。这样一来,自然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不同组合形式。进而言之,为了确保各系不对此设置障碍,我们要求每一个系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教职员不具备该学科的学位。倘若教授们在两个系里都享有充分的权利,那么每个系里的学术讨论、课程设置以及被视为合理或合法的观点都将由于这一简单的行政举措而得到改变。

四、联合培养研究生。研究生的处境与教授的处境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一般也只有一个系里从事研究工作，如果他们想到外系搞点研究，经常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只有在少数几所大学的少数几个系里，学生们才被允许在外面游荡。同样，我们也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为什么不强制性地要求攻读某一门学科的博士学位的学生到外系听一些课，或者搞一点属于外系专业的研究呢？这也许会导致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组合形式。一旦采取一种自由的但却严肃的办法来进行管理，那就会使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得到改变。

尽管前两项建议需要有人作出财政上的承诺，但它们只是要求在社会科学总支出中占一定的百分比，因此不会造成过重的负担。第三和第四项建议实际上根本不会引起任何预算上的后果。我们并不想用这些建议来束缚人的手脚，相反，我们是想通过这些建议鼓励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无疑，通过别的一些手段也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鼓励其他人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再重申一遍：最重要的是，学者们应就一些基础性问题展开明晰的、公开的、明智的和紧迫的讨论。

社会与思想丛书

开放社会科学

华勒斯坦等

资本主义的未来

舍勒

价值的颠覆

舍勒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韦伯

经济与社会规范

韦伯

资本主义的动力

布罗代尔

诠释与过度诠释

艾柯等

宗教：如果没有上帝……

柯拉柯夫斯基

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哈贝马斯等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

社会与思想丛书

开放社会科学

华勒斯坦等

资本主义的未来

舍勒

价值的颠覆

舍勒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韦伯

经济与社会规范

韦伯

资本主义的动力

布罗代尔

诠释与过度诠释

艾柯等

宗教：如果没有上帝……

柯拉柯夫斯基

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哈贝马斯等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

社会与思想丛书

开放社会科学

华勒斯坦等

资本主义的未来

舍勒

价值的颠覆

舍勒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韦伯

经济与社会规范

韦伯

资本主义的动力

布罗代尔

诠释与过度诠释

艾柯等

宗教：如果没有上帝……

柯拉柯夫斯基

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哈贝马斯等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